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5年9月15日第16期 总第139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39期
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五）

目录

【专稿】

章 铎 我所了解的孙蓬一

引言

1. 孙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什么？
2. 孙蓬一批评工军宣队不抓“五·一六”，招来横祸
3. 和“四人帮”作斗争的孙蓬一，被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
 - (1) 群众揭发孙蓬一的五个问题
 - (2) 孙蓬一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4. “四人帮”倒台，孙蓬一灭顶

【述往】

陈金松 北大汉中分校琐忆

【随笔】

刘 若 非常年代

- 1、给张承先通风报信
- 2、大字报
- 3、刘邦杀韩信
- 4、破四旧
- 5、派
- 6、大串联
- 7、点点滴滴

【资料】

孙蓬一等人的“一·二七”大字报

孙蓬一的检查及工宣队的批语

【编读往来】

1. 蒋健纠错
2. 贡安南谈感受
3. 张晓良、庄重远、杨光谈封面设计

【版权声明】

【专稿】



作者简介：章铎，女，江苏省海安县人，1944年出生。1950年随母亲从老家到安徽淮南投奔大哥，在淮南市读完小学、中学。1963年毕业于淮南一中，同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学制六年）。1967年3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了“新北大公社”动态组，负责了解学部、高教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文化革命动态。1970年3月被发配到陕西省宝鸡县，后分配到县农林局工作。1974年3月调入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现宝钛集团）

子弟学校任教。1993年评为中学高级教师（数学），1999年10月办理退休手续，2001年离开教学岗位。近年来主要致力于北大文革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参与北大文革的相关讨论。在《记忆》120期上发表过《季羨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再读〈牛棚杂忆〉兼与舒生先生商榷》一文。

我所了解的孙蓬一

章铎

引言



坐火（上图：孙蓬一像）

1963年，我考上北大生物系。在北大读了两年多一点的书，就被派去“四清”了。1966年6月上旬，回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百万革命群众后，我和班上的一些同学结伴，两次坐火车外出串联。12月9日，我又和李棉生等八人组成了长征小分队，进行了一个月的徒步串联。接到通知要我们回校参加军训，就从邯郸车回来，那时已是1967年1月上旬末了。

回校不久，学校向系里要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了动态二组。不久，两个动态组合并成一个组，组长是胡宗式。我负责跑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学

部的动态。在这期间，我认识了孙蓬一。他直爽、热情、有胆有识，我和好多同学都喜欢他。

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江青说：“她（指聂元梓）的助手不好，出了许多坏点子。”这个“助手”就是孙蓬一。为此，他受到对立派的多次围攻、殴打、通缉。工军宣队进校后，又受到迟群之流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被扣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但孙蓬一始终没有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当他听到“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认为“党得救了，祖国得救了”。

自1976年11月11日至1977年1月12日，孙蓬一给我们夫妇共来了六封信。从孙蓬一的来信中，我深切感到：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他对毛主席、周总理的热爱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境地；他衷心拥护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但是，他却被“无产阶级专政”了。1983年7月13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孙蓬一有期徒刑十年。

2014年10月31日《记忆》第120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二）刊登了由戴为伟整理的《郑仲兵口述——北大文革片段》中有这样一些文字：

（孙蓬一）文革中，他最早提出中央文革极左路线的问题，公开提出反对王、关、戚。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跟他成为好朋友的。

文革后期，工军宣队进校后，他一直挨整。那时候，我们偷偷地见过面。大概到了“四人帮”垮台不久，那是天安门事件一周年（1977年），他还没被解放，他从劳改的地方跑出来，先到天安门广场，再到我家。我们一起去看看阮铭，他（到阮铭家）就跟阮铭说，我真希望邓小平能够早一天出来工作。阮铭挺冷静的，就说：“邓小平要出来，第一个就要拿你这样的人开刀！”当时孙蓬一霍的一下子站起来，说：“即便是这样，为了党、国家、民族的大局，我也在所不惜！”

孙、阮的对话至今还回旋在我的耳际，然而不幸被言中了。过不到半年，抓“五大领袖”的时候，把他也抓了。

我后来找过于光远，因为那时候，邓小平还经常接见他，于光远对我说：“邓小平一旦下了决心的事，很难改变。”他说找机会吧。我还找了陈一谘，因为当时陈一谘和邓朴方是朋友，又和邓力群来往很多。陈一谘原来也是北大的，文革

前被北大打成反革命。在文革中他是井冈山一派的，与聂元梓、孙蓬一是对立面。他就跟我说：“我帮你这个忙，不是为了说明孙蓬一正确，我对他还是有看法的。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对待他是不对的。”后来，他跟我说，他找过万里、邓力群，他们都愿意帮这个忙。但是，即便是这样，大家还是没有帮上忙。因为邓

小平下了决心，确实就很难让他改变。

后来孙被弄到青海，服刑期满了，还在那个（劳改）农场里面，还被变相关押。之后，他的姐姐冒着生命危险，到青海，

1967年秋颐



和园，孙蓬一（前右一）、柴树园（前左一）

把他偷偷地带出来。那时

候已经是“六四”过了。他到了我家，我母亲，还有郑伯农、王若水、阮铭、萧灼基、胡志仁、李春光和另外一些熟悉的朋友都到我家。当时我看他不大正常，谈到激动的时候，把筷子都折断了。因为他是逃跑出来的，他姐姐就把他带到大连去了。他姐姐、姐夫都是老军人，住在一个干休所里。

但是他在那边知道一些六四“政治风波”的真实情况之后，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在干休所大骂。后来家人找个借口，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他从那个地方出来，（病）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他就跟人家说，我现在是工资、党籍都没有，靠老婆养着。后来又一次说，一个部门（大概是民政部门）说他是烈士子弟，一个月补助他15块钱。拿到那15块钱后，他说，你看，我现在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还要靠我父亲来生活。结果当天他就去撞屋里的暖气包，头破血流，没死；以后又想办法用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也被救过来。他本是一个极其自重、自尊

的人，唉，反正他的命运比聂元梓还要惨得多。

1. 孙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什么？

孙蓬一 1930 年出生，他的父亲 1938 年参加八路军，1944 年被敌人杀害。1943 年孙蓬一离家投奔了山东抗日根据地，1945 年参加八路军，1946 年，刚刚 16 岁的他就加入了中国共党。在战争年代，他勇敢不怕死，曾立过功，参加过抗美援朝。全国解放后，对党在各个时期的各项号召，都是带头响应，因此也就成了历次运动的骨干。在北大哲学系，党内一直存在矛盾。1963 年陆平将聂元梓由经济系调到哲学系任总支书记，代替原总支书记王庆淑。当时反对王庆淑一派的领头人是孙蓬一和孔繁。聂元梓来到哲学系一年后，支持了孙蓬一这一派。

1966 年中央文革成立之后，孙蓬一被借调到中央文革，为一般的工作人员。1966 年 7 月底，校文革筹委会成立后，聂元梓将他要了回来，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1966 年 10 月下旬，由聂元梓提议，孙蓬一参加校文革常委会议，孙蓬一管全校的运动、组织和作战，1967 年 3 月，孙蓬一提升为校文革第一副主任。

1966 年 11 月 8 日，由聂元梓、孙蓬一等十一人署名，贴了《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大字报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

1966 年 11 月 19 日，孙蓬一等人随聂元梓到上海串联，在那里参加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一些活动，聂元梓先返回北京，孙蓬一是 1967 年 1 月 7 日回到北京的。关于上海串联，《聂元梓回忆录》和《王力反思录》中有比较一致的说法：聂元梓等人去上海串联，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通过他的女儿李讷，到北大向聂元梓等传达的）。哲学系李清昆老师对我们说：

那天（1966 年 11 月 12 日）上午，李讷来到北大 6 院 2 楼组织组，我、孙蓬一、夏剑豸、陈葆华（女）、付治文都在那里，聂元梓当时不在，她到市里去了。李讷穿一身军装，骑了一辆旧自行车，她一进门就和孙蓬一握手：“孙大炮，怎么听不到你放炮了？”老孙在中央文革工作过，和李讷很熟，她问了北大运动的情况。主要是老孙汇报。她给我们说：“你们不要老是盯住北大，要放眼全国。我们了解，现在上海的造反派正受压，主席想让北大造反派去支援上海的造反派。

我这次来就是谈这件事。”中午饭是到学生食堂打来的，那天正好有米饭，还有饼，就在组织组的屋里吃的，聂元梓当时不在。李讷说：“我要等她回来。”下午聂元梓回来了，李讷单独和聂元梓谈去上海串联这件事。这天，“井”、“红”砸了校刊编辑部，聂元梓和李讷一同去了现场。

校文革商议，由聂元梓、孙蓬一、陈葆华、付治文四个人去上海，票是中央文革办事组买的，坐的是软卧包厢。后来，回来车票报销，办事组让北大报，我说你们报销得了。办事组说：“他们的人事关系不在中央文革，报不了。”后来是北大报的。因为按规定，13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坐软卧，这样只有聂元梓一人可以报软卧（她是12级），其他三人只能报硬卧。差价，是聂元梓掏腰包给补上的。

孙蓬一从上海回来不久，就赶上了一月夺权。

上海“一月风暴”吹到北京，中央号召群众组织夺权。于是，各高校就到自己的上级领导部门和相关单位去夺权。1967年1月18日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市的一些综合性大学，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的夺权当中要下大的力量。”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北大派出了多路夺权大军，其中高教部夺权最引人注目。当北大到高教部时，已有许多单位去了。参加夺权的单位有30多个，组成联合夺权委员会，负责单位是“清华井冈山”。北大去后，反对高教部的“延安公社”，因为“延安公社”的负责人是卢正义、徐非光，北大认为他们是叛徒。师大谭厚兰等认为卢、徐是响当当的左派，坚决支持“延安公社”。“清华井冈山”发表了一个中立宣言，表示不介入北大和师大的矛盾，宣布退出高教部夺权。前期，北大暂时在高教部掌权，处理一些事情。不久，卢正义、谭厚兰等人纠集了数百人搞反夺权，双方发生冲突，称之为“高教部事件”。二月二日，事件发生后，林杰俨然以中央首长的姿态向师大和“延安公社”下达四点“指示”：

- (1) 我们（师大和延安公社）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
- (2) 解放军参与这一行动是错误的；
- (3) 新北大是错误的；
- (4) 解放军马上撤回去。

同日下午，关锋、王力打电话严厉地批评了北大。二月四日，王力、关锋又一次给孙蓬一打电话，批评北大要搞什么三路进军等等，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孙蓬一在1977年1月3日的来信中说：

我历来不太赞成去管校外的事，因为我觉得社会上的问题极其复杂，我们没有能力将那么复杂的事情短期内判断清楚，搞不好容易上当。当若干学校积极干预校外问题时，有的人在我面前抱怨北大，正如北航、清华说我们“窝囊”。不过，我有我的看法。一月份夺权时，若不是总理点了我们的名，我也是不主张我们去参与这种事的。总理指示后，我是坚决响应的，连夜传达、动员、组织，我觉得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我们责无旁贷。但派人出去后，几乎到处都遇到了矛盾，更证明了你们原来的说法是正确的。我的态度是，我们尽量撤出来，不参与其中，可更冷静地观察、分析，以得出准确结论。所以，当一讲了夺权要先解决授权问题，要先开各种代表会后再夺权时，在讨论中，我是主张全部撤回来。当时聂元梓提出，高教部可暂不撤，因为那里发生了原则性的争议。我同意了。结果，发生了高教部事件。

二月二日，王力、关锋分别给我打电话。真是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明明是谭厚兰一伙保卢正义保红了眼，纠集了其同党欺负我们，而关、王却反诬我们打了他们，关、王第一次向我们露出了狰狞面目，赤裸裸地从幕后走到前台。我四处打电话将聂元梓找回来以后，我们去高教部，负屈含冤地将我们的队伍劝回来了。可是正当我们悲愤填膺的群众，在军训解放军的大量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下，刚刚平息下来时，关、王又给我打来电话，说我们要搞三路进军。如果说前一次电话是拉偏架，这一次则是大打出手了。

高教部事件后，北大开始反思前一段的运动。如果说从文化革命开始到一月夺权，孙蓬一和北大的群众是无条件地响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号召的话，那么高教部事件是个转折点——孙蓬一们开始思考了，北大群众开始思考了，不那么盲目了。

1967年1月15日凌晨，统战民委系统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抢劫档案事件。当天，中央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即民院抗大）和统战部的部分群众将抢劫档案的

坏头头刘郢、洪涛扭送到公安部。1月17日，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发了公安部某负责人谈话。这个谈话，将抢档案的刘郢、洪涛说成是革命左派，并以冲击公安部、迫害左派为由，把保护档案的民院红卫兵总部负责人郑仲兵在公安部关押了13天。1.15事件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北大表态支持了以郑仲兵为首的民院抗大，并由此对公安部长谢富治有了疑问。

1967年3月8日，由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新人大公社、石油学院北京公社、钢铁学院919、民族学院东方红这六个单位，提出“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口号。同时提出的口号还有：“揪出谭震林的后台！”。

对于这种突然出现的变化，孙蓬一和我们一样，都很茫然，感到不解。于是，动态组全力投入调查。当时得到的情况是：中央开了会，谭震林说了话。就这么几个字。我们不知道毛主席为“二月逆流”定了性。另外还了解到，他们下一步还要打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余秋里，最后反总理。怎能根据这一点情况，就动员北大的群众跟着他们走呢？那几天，公社总部和校文革的一些委员，天天晚饭后到动态报来，商议对策。大家态度明确：不能反总理。由于情况不明，对打倒谭震林，新北大公社总部迟迟没有表态。3月11日晚上，戚本禹收回了他1月份保谭震林的讲话，公社总部这才正式表态，于3月12日发表声明：“炮轰谭震林！”；3月14日再升调为“打倒谭震林！”。

1967年3月17日新北大公社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必须严格区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是要保，一保到底！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是要反，一反到底！在这里，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浑水摸鱼。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这是新北大公社在反击二月逆流中的严正立场。

新北大公社对待二月逆流的这种慎重态度，被对立派称作“老保”、“二流派”、“二流公社”。孙蓬一和北大的绝大多数师生在反击二月逆流和以后的各种事件中，都坚决站在保卫周总理一边，从未动摇过。1976年11月18日孙蓬一给我们来信中写道：总理逝世时，我在战友相聚时是放声痛哭了一场。现在每当想到总理，我都禁不住要心酸眼湿的。总理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我们应当永远以总理为光辉典范，来安排自己短促的一生。

1967年4月8日，在民族文化宫，为争夺对“民族工作展览”的批判权，以北大为首的一方和以地质东方红为首的另一方发生了严重冲突，俗称“4·8事件”。事件发生后，双方都发表声明指责对方。直接参与这次事件的单位并不多，但声明的签字单位却各有几十个，向社会表明存在两大派。《记忆》第132期转载的“扬子浪日记”关于这一事件有如下文字：

他们砸玻璃门窗，大打出手，无所不用其极，公开对抗军代表命令，继续武斗，终于在凌晨3时半左右占领了全部房间，抢走了全部材料。我也被迫参加了武斗，简直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

挨了打，受了气，丢了材料，还不知道何时才能出气，我们北大他妈的太软了。

洪涛、吴传启、卢正义、徐非光他妈的处处与北大为难，绝无好下场。我们的战斗力将得到空前的发挥，新北大绝不是好惹的。

1967年4月11日下午，地质、邮电、农机、农大、工大、民院六所院校开了六辆广播车到北大闹事。他们高呼“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揪出聂元梓当红代会核心组长的后台！”等口号，气焰十分嚣张。因为是打到自己家里了，我们都非常气愤，大家齐心合力，将他们的广播车推出了南校门。

4月12日晚上，全校召开了誓师大会，孙蓬一气壮山河的讲话，不断地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打断。我们公开向吴传启们宣战了。孙蓬一说：

如果说，在昨天我们有些事情还看不清楚，那么到了今天，那一小撮人的心是路人皆知了。因为马路上都写了大字标语了，他们要干什么，他们的目的已经清清楚楚了！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的民族宫事件本来是微不足道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目的是他们背后的那些人要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政治阴谋！……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为了达到他们垄断、独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这一目的，便不择手段，只要是可以被他们利用、为他们服务的，只要是支持他们的，他们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派，就一律给他们送上一顶最美丽的桂冠：

“革命造反派”。而这样一种力量，采取一种非常不正当的手段，采取拉一伙，打一伙，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当他们跟别人辩论，他们提不出充足证据的时候，便拿出所谓的王牌，说：某某支持我们。不管什么人，只要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他支持了你，那么他也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有必要再一次阐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一股势力的代表，这一股势力的核心不在学校，而是在一些机关，是真正的摘桃派，那是一些什么人？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中央统战部红色联络站。至于还有一些单位，他们人数虽然很多，但是，在我看来，那只不过充当了一个打手，充当了一个工具。

4月13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红代会核心组开会，解决北大和地质的矛盾。北大方面聂元梓、孙蓬一、胡宗式参加会议。谢富治不让北大发言，却武断地说“武斗是北大挑起的”。晚上，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北大，就“4·11事件”表示声援。在大饭厅，自发地聚集了不少北大同学，孙蓬一登台即席讲话，他讲了下午接见的情况和“1·15”事件等。孙蓬一说：

处理“1·15事件”，把抢档案的说成英雄，是左派，而把保护档案的人关进监狱，这是什么逻辑？！在名义上是解决北大和地质的矛盾的会议上，不叫我们说一句话，就下结论，说武斗是我们挑起的，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是他们打到我们家里来的，而不是我们打到他们那里的。是非是如此明显，却视而不见！我们多去了一个人，谢富治便问，地质多去了20多人，什么话都不讲。

另外，孙蓬一还重复了昨天所讲的关于吴传启之类是真正的摘桃派等内容。听了孙蓬一的讲话，大家群情激奋。新北大公社总部组织人要到公安部和谢富治辩论，有些人先跑出去贴了谢富治的大标语。聂元梓、李清昆闻讯赶到现场，坚决制止这种鲁莽的行动，并要求把所贴的大标语覆盖上。当晚，聂元梓口头向驻北大的中央文革记者承认错误，并写了书面检查连夜送到中央文革。这就是“4·13孙蓬一炮打谢富治事件”的全过程。从此，孙蓬一、聂元梓就被扣上了“代

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夺市革委会的权”的帽子。

其实，在此之前，1967年4月10日，孙蓬一已经与聂元梓一起，到钓鱼台当面向江青、陈伯达告了王力、关锋等人的状，在场的还有戚本禹。这件事，孙蓬一1977年1月3日的来信中叙述了详情：

六七年三月中下旬，由北大人事处的李玉英先去解放军报社找了李讷，约好时间后，在一天下午，李、聂和我去解放军报社找了李讷，着重向她谈了高教部事件中的有关王力、关锋、林杰及其一伙的情况，并交给了她有关高教部事件的调查报告，和王力、关锋两次给我打电话的追记稿。李讷当时对我们深表同情，并答应将材料代转到上边去。

高教部事件后，北大从上到下，都在胸中沉积着一股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压抑闷气。“五·一六”们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视我们为软弱可欺，冲突不断发生。我们总是受气，真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不公开起来与王、关、戚对着干，简直要把人气疯、气死了。这伙以“左派”自命的家伙，其篡党祸国的用心，若再容忍下去，则我们是无颜再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居了。四月八日民族宫事件后，我就主张公开反击、指出问题的实质。当时李清昆等人建议为稳妥起见，还是去向江青当面汇报一下，以取得支持。聂元梓同意了。九日写了一封求见信，十日下午她与我就去了钓鱼台。那天正好是清华斗王光美。

……

我们向他们谈了高教部事件，谈了林杰、周景芳、潘梓年、吴传启及其北京市里那一伙，包括高教部的卢正义、徐非光。指出他们这一伙人许多都有历史问题。我则公开说：我们认为王力、关锋是在搞新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当谈到潘梓年、吴传启时，江青说：不是早就打过招呼不和他们联系吗？

我说到王、关包庇那一伙，是搞结党营私时，江青说：我们没有那样的感觉，只是感到关锋的性子拗一些。（谈话结束了）江青送我们到16号楼的门口，还告诉我们，今天谈的事，出去不要讲，特别不要损害了王、关的威信。……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不能反王、关，但是下面的一伙是可以反的，认为江青还是支持我们的，这就更造成了错觉，认为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与王、关、戚不同。

四月十日回来以后，聂与我向校内一些人转达了接见的大致情况。

这次告状，对北大有利的只有江青说的一句话：“不是早就打过招呼不和他们联系吗？”而对告状的主要内容，中央文革是否定的。4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在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的会议上，中央文革对聂元梓、孙蓬一进行了批评：

江青：我首先讲一下，我们小组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全来了。这个一致是表示在主流上的，不要想钻空子，你们要懂得，小心有人钻空子，挑拨离间。

炮打谢富治是不妥当的，是错误的。但不能全赖在聂元梓同志身上。按她的斗争经验、生活经验应该给你们做出榜样。你应当做触及灵魂的检查（指聂元梓）。

姚文元：正如江青同志所讲的我小组在政治上、主流上是一致的，我们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面，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不容许任何人挑拨离间，不要上当。……有人提出摘桃子的问题，摘桃子只能阶级对阶级摘，对敌人是寸权必夺，夺回到毛主席手里，而不是为自己小团体夺权。

康生：谢副总理是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这样一个党、政、军的领导同志，同志们随便写大字报传单上街，这是极大的错误。说谢副总理是邓小平的什么人（××：谢副总理是最早的用文字揭邓小平的问题，斗争很坚决。）这种东西出现是罪恶，是我们的耻辱。……有人对中央文革这样推测，那样推测，还分几派。我们小组是一致的。

陈伯达：现在好像流行一种摘桃子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主席在日本投降以后提出来的，是指抗日胜利的桃子是落在人民的手中还是落在美帝走狗蒋介石手中。……这是阶级斗争，不是哪一小团体和一个小团体的斗争。什么叫摘桃子？不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这个问题就完全错了。

反谢的事平息以后，1967年5月，北大联合一些单位，正式向吴传启们开战了。由于吴传启和关锋、王力的特殊关系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提打吴传启，就有人说你“反中央文革”。

1967年5月28日中午，^① 聂元梓接到电话，要求她在两点之前到达钓鱼台。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她谈话。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的。……你是有水平的，是市革委会副主任，又是红代会的，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和我们共同来做。我们非常希望你合作，你要和我们站在一起。你写的大字报和你在北大校文革的行动，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以后好好地合作。你不要反对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②

陈伯达等人对聂元梓的这次召见，我在“扬子浪日记”中得到了印证：

（1967年）8月21日

晚上，聂元梓讲了5月27日中央文革对自己的批评，共三点。第一点，中央首长说北京两派是聂挑起的，武斗要聂负责。聂辩解，戚本禹不让聂元梓辩解，说：不许你讲。聂说：那我只好到公社去劳动了。戚说：你就是到公社去，还是要找你。会上，聂提出了关锋一月夺权时的那个电话，关锋矢口否认。

显然，陈伯达、关锋和戚本禹一起出动，陈伯达说的话就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央文革的意见。但是，以聂元梓、孙蓬一为代表的北大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立场。6月1日，北大“除隐患”战斗队，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关于吴传启历史问题的第一批材料。如果没有陈伯达的6.5讲话，后面还有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但仅仅这第一批材料，吴传启的后台们便坐不住了，他们愤怒了，软的不行，他们要来硬的了，内部谈话不行，他们要采取公开的行动了。

1967年6月1日，北大在“五四”运动广场召开大会，庆祝毛主席批准广播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周年。这个大会筹备多日，并给中央文革发了邀请信。来参加会议的单位很多，表面上会议是热闹和隆重的。但我们动态组却注意到：中央文革没有人来参加会议，连办事人员都没有；第二天，北京的各大报纸也没有相关的报导。我们感到这不合常理，有一种不详的预兆笼罩在心头。

^① 《记忆》132期刊登的“扬子浪日记”中，这一天不是28日，是27日——本文作者。

^②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第219页。

1967年6月3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外事口的革命造反派时，陈伯达说：“最近街上有这样一些标语，是反对谢富治的标语：‘打到谢富治！’‘谢富治算老几！’现在谢富治是北京市的首长，我投他一票，你们也有一份。这种标语是乱来，属于联动一类。写这种标语的人算老大吗？老子天下第一。自己来当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不是自封的，是大家推选的。”

6月5日晚~6月6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红代会核心组成员的会议上，陈伯达公开批评聂元梓、孙蓬一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他说：

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我前天在小礼堂讲话就是批评新北大的。……前两个月我就批评了孙蓬一。地质去攻击新北大是错误的，孙蓬一就发火了，做了个报告，说我们上上下下万众一心，这没有阶级分析，不科学。你们北大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小资产阶级？有一个会我是批评新北大孙蓬一的。“不是我们垮，就是他们垮，垮了再干。”这也是新北大的一个人说的。孙蓬一有火药味，要有点老大哥的气派嘛，不然你们名誉就损害了。吴传启算什么东西呀？吴传启你们说过就算了，提不上日程上。他这个人排不上我们社会的位置。吴传启我不认识他，谢富治同志也不认识他。有这样一种言论，说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是吴传启所操纵的，这是活见鬼！有人扭住周景芳，他在学部工作。（谢富治插话：他是好人，是造反的。）我刚刚认识他，他是戚本禹同志派他去帮助谢富治工作的，是戚本禹推荐的，关锋同志还不愿意呢，要把他调到红旗，我当时也同意了，这是一个老实人，别冤枉好人。吴传启不可能操纵我们的报纸，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你们硬把他抬上来，这不是见鬼吗？……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北大拿这个借口少数人搞分裂，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想利用这个来搞内战，这一两个人就要垮台。他认为打中了，可以把北京市委的权夺过来了，这是想入非非，胡思乱想，这种人一定要垮台。回去跟孙蓬一说一下，我不怕他进攻我。

陈伯达的“6.5讲话”是要灭火的，用的是釜底抽薪的办法，阻止北大进一步公布材料，把揭露吴传启的行动扼杀在摇篮里。这篇讲话同时也是点火的，

在北大校园里点一把火，让北大内部闹起来，自顾不暇。陈伯达为什么要贬低吴传启的作用呢？身为中央文革组长，难道他不知道吴传启的背景，不知道吴传启一伙的势力和能量？陈伯达这样说，就是要把群众引向歧途，让群众对北大反对吴传启的行动产生疑问，把矛头引向聂元梓、孙蓬一。

事实上，吴传启、林聿时等人控制了学部以后，就把手伸向了社会。他们的手在当时已经伸得很长了，或者说，吴传启们的手“被”伸得很长了。吴德在他的回忆录《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①中这样说：

（北京市革委会）新进来的人大都是王、关、戚支持的学部的那一派，约二十多人。哲学所的造反派头头周景芳担任了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杨远担任了办事组组长。办事组等于是市革委的办公厅，一切机要都由杨远控制了。……革委会成立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屠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屠武生，所有的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

尽管吴德说得比较简略，但其中揭露的事实，难道还不够怵目惊心吗？

在陈伯达6.5讲话的刺激下，北大内部果然闹起来了。6月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成立。“北京公社”、“红旗飘”、“井冈山”、“东方红”等组织纷纷亮明了反聂的旗帜。7月1日，以周培源为首的134名干部发表了《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明确表态：“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反对派多次围攻、殴打孙蓬一等人，不断挑起事端。

据陈焕仁的《红卫兵日记》^②记载：

6月10日

校文革安排孙蓬一，在大饭厅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的“6.6”通令。听到校文革安排孙蓬一传达“6.6通令”，新北大公社的人早早地到了会场。

^① 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1月，第36~37页。

^②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8~350、367页。

自从陈伯达同志“6.5重要讲话”传出后，北京公社四处捉拿孙蓬一，新北大公社的人再也看不到孙蓬一的身影。新北大公社的人看到孙蓬一雄赳赳气昂昂地步入会场，全场一齐拼命为他鼓掌，不少人高喊：“孙蓬一是坚定不移的革命左派！”一齐上去将他围住，孙蓬一又像英雄一样登上主席台，全场顿时欢声雷动。

孙蓬一站在台上，不停地挥动《毛主席语录本》，北京公社的人突然冲上了主席台，硬要揪孙蓬一去接受批斗，新北大公社一涌而上，将孙蓬一从北京公社手中抢了过来，双方在台上扭打成一团，63军闻讯赶来，强制性地两派群众分开，把孙蓬一救了出来。

6月12日

昨天，孙蓬一在办公楼礼堂传达“6.6通令”，北京公社没敢再去冲，今天终于结束了多少天来躲躲藏藏的生活，主动到我们“6.6串联会”（“6.6串联会”是当时新北大公社内部，帮助孙蓬一整风的公社红卫兵召开的串联会）上来，虚心地接受我们的帮助和批判。

孙蓬一刚从家里走出来，还没来到我们会上，在路上就被北京公社发现了。多少天来，他们千方百计四处捉拿孙蓬一，前天在大饭厅好不容易将孙蓬一捉拿归案，又被63军救走了，今天孙蓬一刚刚出现在他们的埋伏圈中，他们蜂拥而上将孙蓬一团团围住，就要扭住孙蓬一押去批斗。孙蓬一不仅在朝鲜战场与美帝国主义较量过，而且跟陆平作过拼死斗争，从来就是个不信邪之人，即使眼镜和帽子被抓掉，被人打翻在地，仍然死不从命，新北大公社闻讯立刻报告63军解放军，解放军再次将孙蓬一救出来，孙蓬一终于来到串联会上。

7月10日

北京公社连续不断地冲击聂元梓和孙蓬一的检讨大会，聂元梓、孙蓬一又改为在广播上作检讨，两次广播大会照样被北京公社冲了，还从广播站将孙蓬一抓出来，砸碎了孙蓬一的眼镜，扭伤了聂元梓的胳膊，聂元梓不得不赴中央文革，向中央文革作了紧急报告。

刊登在《记忆》132期上的“扬子浪日记”中有如下文字：

6月15日 从昨晚起，因为聂元梓没有参加“北京公社”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北京公社”、“革造总部”、“红旗飘”开始了所谓的静坐示威。整个静坐示威没有“静”的感觉，毫无悲剧气氛，吵吵闹闹，俨然一出滑稽剧。

7月2日 北大就在这样的僵持状态中渡过了半个多月。29日孙蓬一作了一个检查。我们认为比较好的，态度诚恳。老孙是真正认错了。

7月10日 校文革召开了广播大会，聂元梓、孙蓬一分别作了工作布置。○、飘方一小撮挑起武斗，冲击大会会场，围攻聂元梓同志，殴打孙蓬一同志，作出了露骨的表现。当晚我“新北大公社‘6.6’串联会”和“联战团”集会，对此强盗行径表示愤怒和抗议。会后在校园内示威，并在毛主席塑像前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

7月12日 11日晚上，北京公社、红旗飘、革造，一方面在五四广场召开大会，斗争陆平，制造假象；同时又积极调动队伍打、抢、抄“二组”、南阁“伏虎团”、新北大公社“二支队”、“工总支”等单位。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忍无可忍，但仍然以6.6通知为重，避免了大规模的武斗。

8月15日 最近北大气氛又有变化，沉闷得很。中央首长批评北大、限制北大。北京市这两大派究竟是怎么回事，令人费解。

我预感到某种不幸和危险，总觉得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离中央文革越来越远。

有一件事需要提及，这就是“007密令”和“与许维刚谈话纪要”。

所谓“007密令”，是湖南“湘江风雷”的坏头头对总理的陷害。1967年3月，湘江风雷北京支队队长许维刚（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的成员）找到胡宗式，想通过聂元梓将一份材料（有关007密令的问题）通过聂元梓转交江青。材料的内容是诬陷总理要搞军事政变。他们将材料复写了三份，想法托人送中央。许维刚的这份是其中之一。胡宗式把这份材料交给聂元梓，第二天，聂元梓对他说：“反总理是不对的，这份材料我不给转。你到44楼3楼，把它交给中央记者站驻北大的记者，我先打个电话。”胡宗式在转交材料时写了一个附言，说明了许维刚的身份并且写了“这是对总理的陷害”。涉及“007密令”问题的还有孙蓬一和“除隐患”战斗队的人。

陈伯达 6.5 讲话后，我们动态组的刘志菊到东郊机械学院找许维刚，了解一下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许是机械学院东方红的成员，在跑动态时与他相识。他谈话的中心是：**现在社会上这样激烈的斗争，反映了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北大站错了队，你们站在总理的一边。你们被老三收买了。**刘志菊问许维刚：“师大的后台是林杰吗？”许说：“**不是，是比林杰还要大得多的林。你们北大是反林保周。**”我们觉得许维刚的观点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社会上一批人的观点，认为有必要把他的话上报中央。于是就由胡宗式执笔，整理了一份谈话纪要。此件经校文革办公室上报，有案可查。

无论是“007 密令”，还是“与许维刚谈话纪要”，可以看出，我们保卫周总理的态度都是坚决的。1976 年 12 月 11 日，孙蓬一在给我们的来信中写道：

关于 007 密令，你所说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给邓大姐写过信。“四人帮”揪出后，又写了一封信，只谈了这一个问题。……（1967）6 月 19 日晚，在校文革常委的一再催逼下，聂打电话给陈（伯达），让其来北大看看。陈派他的秘书王文跃来了。是我和聂向他汇报。汇报的主要材料有：市革委会王乃英动态组一工人揭发王乃英专门搞我们的材料；还有你们提供的所谓我们被“老三”收买的材料；再就是“007 密令”的调查报告。聂去西郊机场送客人，还当面交给邓颖超同志一份这个调查报告。聂当时回来说，邓大姐对我们对总理的爱戴表示感谢。以后我们又上报了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有成员。我们这是昭若日月的保总理的行动，可是迟群之流却硬是逼着×××等人，承认这是反总理。其用心之险恶，是为了扑灭任何敢于挺身而出保总理的力量的。我过去一直只知道我所了解的一部分。写信时只就到这一部分。听了你说的，才知道还有这一部分。



上图：关锋、王力倒台后，《火车头》、动态组成员与聂元梓、孙蓬一等人
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合影。中排左四是孙蓬一，左五是聂元梓。

《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1968年

3月20日

深夜，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组织群众到北大校园内示威游行，井冈山兵团也内应组织示威。游行示威中高喊：“打倒反革命聂氏家族”，“把小爬虫孙蓬一揪出来示众”等口号。

3月22日

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发出《通缉孙蓬一的通缉令》。

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1000多人来北大游行，呼喊：“打倒孙蓬一”、“揪出聂元梓”等口号。

3月23日

新人大公社等六个造反组织到北京市革委会示威，并发表《声明》：“打倒聂元梓、孙蓬一”，“聂元梓从市革委会滚出去”。

3月24日

北京农业大学一些造反组织到北大示威，宣传“打倒聂元梓”。

3月25日

地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造反组织近万人到北大校内宣传，声援北大井冈山兵团。

3月26日

地院东方红几百人手持木棍，从东、西、南校门闯进北大，发生武斗。

显然，上述这些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到底是谁在策划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文革过去四十多年了，至今，这仍然是个迷！

北大大规模的武斗终于在1968年3月29日的凌晨爆发了，长达数月之久。

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接见“五大领袖”，标志着以学生为主体的文革终于结束了。从1966年6月1日算起，共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不久，61年、62年入学的学生陆续离开了学校，我们这些63~65年入学的人，直到1970年3月中旬才被发配离开了学校。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以聂元梓、孙蓬一为首的校文革结束了领导北大文革运动的使命，开始接受长久的批判、斗争。

起初，工军宣队对孙蓬一采取“拉”的办法，对孙蓬一的态度比较好。我看到孙蓬一写的一份检查，标题是“切实记取教训，认真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这份检查的时间应该是1969年的国庆前后），上面有哲学系军宣队魏指导员的不少批注。容易看出，当时的宣传队对孙蓬一是做了不少的思想工作，并且孙蓬一检查的态度也是诚恳的。

孙蓬一检查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许多错误，例如，对待孔繁、杨克明处理中的错误；对“井”、“红”处理中的错误；对待井冈山兵团的错误等等。对北大的武斗，他在检查中这样说：

我们不是团结两派群众共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阶级敌人，而是站在一派一边，支持武斗，指挥武斗。三月二十八日，如果我们顾全大局不去攻占三十一楼，北大这场大规模武斗是不至于发生的。4.26武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也正是我这种错误指导思想所造成的恶果，我负有直接责任。是我从一派利益出发，图报复，不顾大局，决定去夺36楼的。结果使阶级弟兄互相残杀，许多同志无辜地流血受伤！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殷文杰同志的被刺死！4.27殷文杰同志的死和我4.26的错误有密切关系。正因为我的错误决定，造成双方很多人受伤，当

时，公社方面伤的较多，这就更使报复的情绪增加，导致了这样一起惨痛事件的发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直接犯下这一错误的同志，当然应牢记这一血的教训，不过，主要责任在我而不在他们。刘伟同志的被打死，我也是负有责任的。我请求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2. 孙蓬一批评工军宣队不抓“五·一六”，招来横祸

1967年5月16日，中央公布了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同时大力宣传通知的伟大意义。一些极端分子，认为“通知”的重新发表，是要揪出一个大人物的信号。春夏之交，由北京几个大专院校少数人秘密串连组织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该组织公开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和标语口号。北大广大革命师生对这种反周总理的行径表示坚决反对，动态组及时把相关情况向校文革和公社总部作了汇报，并把得到的传单通过校文革的机要员送到总理办公室。9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时，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为“反动组织”。当时公安部抓捕了五·一六成员，这个组织活动的时间只有3个月左右。后来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把“五·一六”问题大大扩大化了，把反总理、反军、反对新生的革命政权等都归为“五·一六”活动。1968年中央成立了“五·一六”专案小组，组长是陈伯达。庐山会议后，陈伯达倒台了，吴德任组长。

1968年至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范围内达到高潮。1970年3月，党中央又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把这场自1967年下半年以来时断时续的清查再次推向高潮。我手头保留了一本当年的“政治学习笔记”，上面抄录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黄永胜、谢富治等领导人关于抓“五·一六”的指示。现将部分指示抄录如下：

毛泽东：“五·一六”是一个最凶恶的敌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林彪：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

周恩来：“五·一六”是搞反革命活动的。他们不按中央指示办事。中央

不让他搞，他非搞不可。例如中央的权不让夺，他非夺不可，中央的话不听，王、关、戚的话就听。王、关、戚一说他们就动。

江青：“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

1969年3月24日，毛主席派8341部队进驻北大，以迟群、谢静宜为代表的工军宣队，一方面纠正前一段宣传队的扩大化问题，另一方面又继续清理阶级队伍，把斗争的矛头重点指向校文革的“一派掌权”上。当很多单位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清查“五·一六”时，北大宣传队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我们宣传队一进校就批判了极左思潮，早就紧跟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现在我们学校不搞“五·一六”，外单位搞，我们要大力支持，但我们不参加，我们现在搞教育革命也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1970年1月27日，孙蓬一、高云鹏等人写了一张题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字报（简称一·二七大字报；全文见附录）。从这张大字报开始，孙蓬一等人开始受到迟群之流的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1970年2月6日下午，迟群在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全体成员会议上讲话（这个讲话也传达到全体师生员工），他说：

最近有孙蓬一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我们认为这张大字报不能孤立地来看，要有分析，要有路线斗争分析，联系北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来分析，联系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刚刚掌握领导权来看它，要联系宣传队所走的路程来看来分析，要联系宣传队进校后有一个占领与反占领、夺权与反夺权的问题。大字报的要害就是要翻案，要夺权。这张大字报涉及到工人阶级，要不要工人阶级，要不要毛主席的这个点。大字报的作者直截了当地告诉宣传队：“你们已经滑到右倾泥坑中去了。”这是对毛主席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其实你们已站到了五·一六一边，做了他们的防空洞，阶级觉悟太低，这样必然是敌我不分，不知团结谁，打击谁，对毛主席不忠。毛主席讲，无论如何要巩固工人阶级领导，这是忠于毛主席。锋芒所指非常清楚，我们不是瞎子。……

作者提出“乱敌人树队伍”，就是要大乱一场，重新组织队伍。你要乱谁？重新组织什么队伍？你那个队伍清吗？清出102名叛特反，这不是事实吗？作者不但在乱群众，要乱工人阶级，乱团结。他到工厂后到处造舆论，北大的原则问题没解决，问题不在下面，在上面。挑拨工人与解放军的矛盾、两个解放军的关系。乱不是乱敌人，要乱的是工人阶级。……

我手头有一封孙蓬一写给陈莲的信，讲述了一·二七大字报贴出后的一些情况。他在信中提到：

自从一月廿七日贴了一张大字报以后，宣传队开始在表面上保持了一段沉默。二月二日，开了指导员会议统一了思想，紧接着就分头在骨干中统一思想。说我们的大字报其要害在“夺权”、“反右倾”、“反工人阶级”，是“五·一六”嫌疑等等。四日，我所在的小分队，则布置整我，由于我的坚决抵制，使他们几个会都未开成。五日凌晨突然作出决定，把在京分散在各个点上面的所有人员一律撤回。昨天才开了革委会，主要领导全员参加，主题是批判我们的大字报和我。除了反革命的帽子未戴以外，什么帽子都扣上了。说大字报是“反党”，说我是“右派”，连个劝退与吐故的党员都不如，等等。下午则召开了全校大会。迟群在大会上做了长达一个半小时讲话，对我们的大字报逐段批驳。气势汹汹，简直是泰山压顶，只点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在？？（这两个字没有认出来——本文作者）上我公开表示绝不能接受他们强加给我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他们不让我发言。在全校大会上，我当众三次要求发言1~2分钟，也被无理拒绝。

大会后，则动员全校群众对我们进行围攻。现在一个调子的大字报、大标语已贴了不少。什么“强烈要求开除孙蓬一的党籍”、“撤销孙蓬一的一切职务”、“彻底批判孙蓬一的1.27大毒草”、“坚决打掉孙蓬一的反动气焰”等等，好家伙，神经衰弱的人可真会给吓死了！可是，对我们来说，既然扪心自问是为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江青同志，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主席思想，为了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如您们感人极深的诗句中所说的：“革命何惧苦与死，无私无畏壮志情，朝阳驱散千层雾，万里长征第一程”，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心情。我们五个同志中，除了一个同志外，没有任何压

力之感。我们通过几年来严酷的阶级斗争的摔打，深知，“压力者，纯属自己压自己也”。

我还看到地球物理系2月3日在全系教改小分队会议上一些领导人和宣传队员的讲话（摘要）。以下是这次会议上的部分讲话内容：

沈一雷（指导员）说：我们北大工作以战备为中心，带动教育革命，不单独搞抓“516”的运动，如果不根据北大的实际情况出发就不行。

张连长说：我们不是不抓“516”。他（指孙蓬一）是不是“516”，我有些怀疑。他们利用社会上抓“516”这个问题的时机来搞活动。

王印尼（军宣队员）说：社会上搞我们支持，社会上哪个单位牵到我们学校的要抓出来。我们北大是以战备为中心，搞好教育革命，不单独进行清理“516”的工作。

从不抓“五·一六”，到大抓“五·一六”，迟群、谢静宜之流用政治流氓的手段对付孙蓬一等人：你不是要抓“五·一六”吗？好吧，你就是“五·一六”！我们就来抓你！真是无耻之极！

但是，大字报本身也说明了孙蓬一中毒太深，竟把“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那样紧。其实，孙蓬一等人就是没有想明白，自从工宣队7月27日进清华，毛主席就把学生运动抛弃了。你还紧跟什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真是不识时务，太愚忠了！

3. 和“四人帮”作斗争的孙蓬一

被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

工、军宣队在学校组织群众大规模批判孙蓬一，系工宣队也找我谈话，要我揭发孙蓬一。我很想紧跟工军宣队，可我真的找不出孙蓬一的任何问题；又怕胡宗式在宝鸡不了解学校的情况，万一学校派人找他，而他又没有思想准备。我心中一直七上八下，多次写信给他，向他介绍学校的情况，并在信中抄录了生物系印发的、群众揭发的关于孙蓬一五个方面罪行的材料。当时看这份材料，个别内容有点问题，比如怀疑康生等人，但大部分内容是孙蓬一说的一些大实话。事实

上，群众揭发孙蓬一的五个问题，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就是五顶大帽子。即使在当时，怀疑康生算大的问题，也仅仅是怀疑。说康生是关锋的后台，本不是什么秘密，也不必怀疑，是康生自己说的：“有人说我是关锋的后台，那我就是后台了。”

下面是我1970年2月14日写给胡宗式的信，全文如下：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宗式：

寄去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吗？

学校现在批判孙蓬一的运动正向纵深发展，工宣队的师傅也投入了战斗。孙蓬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现在被揭发出来的有：怀疑、反对康老，反张春桥，反对谢富治等等。另外还有很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右倾言论。今天又揭发了他吹捧杨献珍，搞合二为一，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现在对孙蓬一的结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漏网大右派。8341部队的王副政委在对宣传队的讲话中说了，孙蓬一是比516还516，这种思潮不仅在北大，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有，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下个礼拜还是批判，可能是星期一、二就要召开全校批判大会。因为批判孙蓬一，毕业也推迟了。

过去我们受孙蓬一蒙蔽，看不清他假左派真右派的实质，现在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与孙蓬一作坚决的斗争。

今天工宣队师傅找我个别谈话，要我揭发孙蓬一反动言行。可我实在想不起来，觉得很为难。你是不是替我想想，孙蓬一过去所干的有哪些坏事，说过哪些反毛泽东思想的话？（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比如反康老，反谢，反张春桥等？）我们过去所处的地位，决定了我们是“知情人”，揭发不出来，也就等于包庇孙蓬一，这可非同小可。

下一步批判，主要批判孙蓬一（1）是大右派；（2）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3）假左派，真右派；（4）向工人阶级夺权；（5）对群众的恶劣态度。

我接连写给你好几封信了，目的是希望你能认清形势，不犯错误，紧跟毛主席，彻底闹革命。你应该仔细阅读我写给你的这些东西，不知你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摘抄了系里油印的材料给你，供批判用。寄给你的批判材料我只抄了那么一份，请你保留起来，我以后还需要，信就不必保留了。

你写的揭发材料，如果有必要的话，寄挂号信来。

祝永远忠于毛主席！

章铎 70年2月14日

(1) 群众揭发孙蓬一的五个问题

自从2月6日迟群讲话后，全校立即掀起了批判孙蓬一的高潮，批孙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但我们生物系的学生不了解情况，根本揭发不出什么问题。为配合大批判，系里油印了一份材料发到各班，供大家批判时参考。以下就是我随信寄给胡宗式的这份材料（我隐去了揭发人的名字）。

A. 关于孙蓬一反对康老的言论

1、一月二十九日，孙从学校回二机床，打听二机床军宣队传达北京市关于“五·一六”的问题，朱×（教师）把记录念了一遍，孙连问了两次：“讲话提到康生没有？”朱说：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江青同志指示。孙：“啊，没有提到他，没有提到他。”

2、他们把××同志说成是×××的后台，他们在反对××同志时采取两面派手法，支持××同志的声明。（孔×、贾×、赵×大字报 2·10）

3、他说五·一六的后台不止是王、关、戚、肖华，还有别的……。 （地球物理系大批判组 2·10）

B. 关于孙蓬一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

1、在芦子水，有一次张光明连长叫他说说过去艰苦生活，解决怎样对待困难。孙说：“过去吃得饱，现在吃不饱，没法讲。” “要把苦说成甜，我还没有这种感情。”

2、去年十一月份在芦子水，一天晚上，孙××、夏×、孙去隗永瑞家访，帮助砸核桃。孙问：“你们家有没有在外工作的？”隗大娘说：“我们家没有在外当官的。”孙说：“没有当官的好啊，都是被压迫者。”隗女儿隗和棉说：“说这个不好。”

3、在芦子水（十一月份）宿舍对夏×、孙××谈到毕业分配时，孙问夏×家有什么人，“要不要照顾”。后谈到战备，孙说：“仗打起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打不起来，各种矛盾又要突出起来。”

4、在三年困难时期，孙对困难的原因是有看法的，孙说：“精简人员到农村去，等于失业。”

（邱××日记本上写的，孔×揭发）

C. 关于孙蓬一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1、孙蓬一在 8341 部队和工人阶级开进北大结束了“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的落后局面后，他在下面散布“北大的问题复杂，中央还没有做出结论”。

（陈××、赵××、夏×大字报）

2、在七·二八召见后，孙公然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谣言，说什么“打电话问了毛主席，主席说工人进清华是镇压学生运动”。

（地球物理系大批判组 2·1）

3、七·二八召见时，主席批判了极“左”，但孙蓬一却把武斗说成是“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右倾机会主义。

（地球物理系六三·二班 郑××、陆××等 13 人 2·10）

4、歪曲篡改毛主席最新指示，胡说：“国民党里的兵也大都出身贫下中农，我们照样打”，以此煽动派性，大搞武斗。

（哲一排夏×、陈××、陈×、李××等大字报 2·10）

5、孙蓬一在清队时，他说什么：“我怀疑政策攻心能把敌人攻出来。”

（哲三排 魏××等大字报 2·10）

6、在整党时要斗私批修，孙蓬一说：“我没有认识到。”

（哲三排 魏××等大字报）

D. 关于孙蓬一对抗工人阶级领导，猖狂向工人阶级夺权

1、在芦子水对林××说：“北大问题现在不能做结论，要等历史做结论”，“北大问题很复杂，比哪个单位都复杂，比清华复杂，谁来都解决不了，只有毛主席亲自来抓。”

2、李××揭发：“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孙蓬一主张冲击张春桥同志。”

3、在芦子水，杨××和孙蓬一谈话时，孙说：光说发展党员，材料不给孔×看，孔有意见。“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先进组织，还要工人阶级领导，支部上面，还有一个工宣队支部，我看这样长不了。”杨说，这是最高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4、孙蓬一在二机床打电话（给学校）问：“学校轰起来没有，宣传队坐不住了吧？”

（中文系学生阮××）

5、一月十七、十八日在二机床宿舍，有孙××、易××等人，孙谈了外单位抓“五·一六”情况，说：“北大的问题真有意思，颠过来，倒过去，翻来覆去的。”

6、孙蓬一说：“谁也管不了我”，说军宣队负责同志“没有什么了不起，脱下军装还不是同我一样。”

（政治系赵××、王××等大字报 2·10）

7、孙蓬一说：“现在北大没有我说话的地方。”

（新华印刷厂教改小分队中文系十战士）

8、以交流经验为名，在下面散布“北大问题就是复杂，要翻过来倒过去搞这么几次才能解决问题。”

（哲一排 罗××、陈××、林×等大字报 2·10）

9、孙蓬一到二机床不久，他就经常和一些同学谈外单位抓“五·一六”的情况，说这个宣传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个学校宣传队做了检查，然后就意味深长地说：“北大问题真有意思，颠过来倒过去，翻来覆去的。”

（哲学系赴二机床教改小分队大字报 2·9）

10、孙蓬一到二机床经常外出总不请假，当工人师傅批评他违反组织纪律时，他竟暴跳如雷说：“我根本不存在向你们请假不请假的问题”，“有话直说，根本就不是纪律不纪律的问题，就是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你们害怕了。”他还冲着工人师傅、军代表说：“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去后，有的人笑了，有的人跳了，有的人心虚了。”当军代表批评他时，他马上对军代表说：“你不就是个军人吗？我也当过兵，我就是不穿军衣的军人，你没有什么了不起。”

（哲学系赴二机床教改小分队大字报 2·9）

.....

E. 关于孙蓬一破坏教育革命，攻击校领导小组成员

- 1、十一月初，在芦子水背玉米吃饭时，有的同学问孙蓬一怎么搞教改，孙说：“教改先改人，改人先改魂，该魂就是要劳动，劳动就是教改，教改就是劳动。”有的同学说：“你这是错误的”，他说：“你批判，这是王副政委讲的。”
- 2、在芦子水一次教改会上，打着关心群众生活的旗号，胡说什么：“现在有的同学得了浮肿病。”威胁宣传队要少安排劳动，多增加营养，制造师生和宣传队的对立情绪。
- 3、孙蓬一对于××说：“就是因为咱们尽了党员的义务，越级了，所以这样搞我。”
- 4、在2·11批判孙蓬一大会上，孙还叫嚣，“谁审判谁还不知道呢”，并说：“是工人阶级掌权，但有隐患。”

我没有揭发出孙蓬一的问题，心中一直忐忑不安。一个多月后，我们这些文革前入学的三千多人就被发配离校了。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同学告诉我：一·二七大字报后，有一次在大饭厅召开批“五·一六”的会，孙蓬一和迟群抢话筒。可惜我没有看到这个场景，我们都挺佩服老孙的勇气。

(2) 孙蓬一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陈伯达1970年4月3日来北大，主要是和周培源谈批判相对论的事情，一开始也对1.27大字报谈了看法。他说：

“一·二七”大字报我看了，主要是个权的问题。孙蓬一不是还反对过聂元梓吗？这些人都是争权夺利，对他们搞吴传启你们还是要承认的。吴过去我也不太清楚，他们送了一些材料，还是比较早的么，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送给谢富治同志，只是给我？这里也就有名堂了。（宣传队：他们搞吴传启，也搞了谢副总理，还有什么“×××”）可能还有陈伯达。你们还是说他们搞吴传启，都否认了他，他总是不服气。

陈伯达说“对他们搞吴传启你们还是要承认的”。因为这句话是对孙蓬一有利的，所以，《北京大学纪事》干脆不提陈伯达4月3日来北大。

另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1972年

10月18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认定聂元梓、孙蓬一是犯了“五一六”罪行的首恶分子，提出暂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以观后效的处理意见。

1973年

3月1日 校党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聂元梓、孙蓬一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专案组汇报说，孙蓬一的主要罪行是：（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反周总理；（二）伙同聂元梓反谢富治、妄图颠覆市革委会；（三）挑动武斗，怂恿凶手打死三名青年学生，包庇凶手。

会议决定：同意给聂、孙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报市委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进行批斗。

孙蓬一明明是坚定不移地保卫周总理，却被迟群之流反诬为“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反周总理”。当时，孙蓬一最大的“罪行”是在1967年4月13日煽动群众炮打谢富治。本来这是对谢富治倒行逆施的一种批判，根本不存在要夺市革委会的权。谢富治是自己打着灯笼，投靠“四人帮”的。和谢富治的斗争，也是反击“四人帮”的一个部分。孙蓬一何罪之有？！

北大的武斗，孙蓬一负有一定责任。但是，说他“挑动武斗，怂恿凶手打死三名青年学生，包庇凶手”，有确凿证据吗？

1967年4月10日，孙蓬一和聂元梓到江青那里去告状，说王力、关锋结党营私，招降纳叛。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啊！一些当权者像鸵鸟一样，就是不承认聂元梓、孙蓬一反王力和关锋。我不禁要问：那时你们在干什么呢？！也许，还是陈伯达说得对：“你们还是说他们搞吴传启，都否认了他，他总是不服气。”把功劳说成罪恶，能让人服气吗？！

说到底，孙蓬一的问题就是没有顺从工军宣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欲加

之罪，何患无辞！

4. “四人帮”倒台，孙蓬一灭顶

“四人帮”倒台后，孙蓬一欣喜万分，夜不能寐。他在1976年11月18日的来信中写道：

“四人帮”之上西天的消息，我是十日知道的，已经迟了。他们的今日，早是意料中的事，我倒没有过速之感，相反，主席逝世后，他们还十分活跃，我都有些焦急了。消息传来之后，我的大脑皮层进入了超限兴奋状态，持续几昼夜，上下眼皮安定团结不起来，过了几个与近些年我的常伴——失眠性质迥然相反的不眠之夜：过去是委屈、悲愤、忧党、忧国，不眠的夜晚是难明的长夜，这次，是胜利、解放、宽慰，以前是痛苦，此次是幸福的喜悦。一句话，太高兴了！这帮家伙不垮，再下去几年，神州会变成什么样子？！看到现在这副痛的局面，对未来，则更加不寒而栗了。当然，对未来的最终结局，我从来是信心百倍的，不管道路将如何曲折，真理终将战胜错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共产主义终将实现。只是为我，几位父老兄弟姐妹在“四人帮”的魔爪铁蹄下，将付出更多的惨重代价，我是痛苦得心裂肠断的。他们完了，人民得救了！尽管征程上还会有风浪，但坚冰毕竟从此打开，中华民族新的一页历史开始谱写了。总的方向，是任何人也再扭转不了了。我为此而狂欢，而痛饮。我们过去的行动，是对得起祖国的历史的，这是我们所追求的最大安慰。至于个人的功罪，根本无须任何人评说，我们是凭共产主义者、革命者的良心行事的，不求别的，只求活着时能问心无愧，死时能有颜面去见马克思，那就不枉此生了。生命是短暂的，只有真正做一个忠于自己的信念——共产主义的人，生活才会真正从动物界里提升出来。我没有被“四人帮”压垮、消灭，活下来了，而且目睹了他们的可耻的今日，就是靠这种理想的力量支撑下来的。

对江青，我们是有个认识过程的，开始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虔诚，当然也就对她十分尊敬，特别是当我们反王关戚时，王关戚的拥护者也有反她的，就更加增加了她与她们不是同根的假象。六七年师大的九·七事件以后，我第一次对她有了怀疑，因她在接见“五大领袖”时公然责难韩爱晶给总理写报告，责问韩：你还要不要革命了！林彪事件以后，她给林彪照相引起我进一步怀疑，及至到了

批林批孔以后，我不仅把她彻底看清了，而且把她恨透了！

总理逝世时，我在战友相聚时放声痛哭了一场。现在每当想到总理，我都禁不住要辛酸眼湿的。总理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我们应永远以总理为光辉的典范，来安排自己短促的一生。

我在“四人帮”揪出以后，先后给吴德、先念、邓颖超同志各写过一信，至今还未见什么反响，我也不急，但准备继续写。我还在家中修养。自七三年以来我大部分时间在家修养，去年至今一直住在家里。半个月左右去一次学校看看病，我是劳动中歪伤了腰，目前椎管狭窄，压迫右侧坐骨神经，行动还可，只是常常作痛。没有什么了不起，请勿念。这几年时间我没有虚度，尽管效果不佳，但我还是坚持了学习，还学了一下英语，有点收获。

孙蓬一 1977年1月12日来信写道：

今年总理逝世周年祭。天安门前再次泛起悼念的大潮。广场虽已圈为纪念堂工地，但宽阔的长安街，巨大的观礼台，沿街灯柱和苍松，华表和金水桥，仍可汇容花圈、花篮、挽幛、画像等多种祭品。花如海洋人如涛，天安门较去年又呈现了一幅奇景壮观，恐怕自人类历史以来，从未见过这种壮烈的场面。

我们过去对总理的热爱，许多是凭直觉，是凭宏观甚至是宇宙，因为总理的禁止，又有人阻挠，过去从无人宣传过总理。这次虽然禁锢初开，但也使人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宝藏。黄帝的子孙，能出这么一个杰出的代表，是堪称人类之花的，这确实使我们作为他的同胞而感到无上荣光的。我最近天天看报、听广播，每次都禁不住鼻酸、身热、眼泪流的。太伟大了！太感人了！不管暂时人们如何评说，但我们问心无愧地可以告诉后代，我们在伟人的困难时期，是较早地挺身而出做过保卫的。尽管为此受了近一个时代的折磨，也是完完全全值得的。

斗争还在继续。只要能彻底，我想我们所谓的“罪”，都会还以本来面目的。我们不能只等待，也应把力量投入到斗争的洪流中去。尽管涓涓滴滴，汇合起来就是排天巨浪，目的不在于为个人昭雪，而在于尊重历史，彻底吞没一切活妖死鬼，使“四人帮”永世不得翻身，以振兴我们伟大的民族，伟大的祖国。

但是，孙蓬一高兴得太早了，更大的厄运在等着他。请看《北京大学纪事》：

1977年

1月20日 哲学系总支、武保部向党委上报《关于聂元梓、孙蓬一的情况报告》。《报告》反映：聂元梓声称她是受“四人帮”迫害的，审查她是不对的；孙蓬一到哲学系闹，说他是受江青迫害的。

2月15日

校党委开会，传达市委负责人2月14日听取北大、清华运动汇报后的指示精神。市委领导讲，……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包括两个估计。毛主席批准的，不能动摇。……十七年不能翻，两个估计不能翻，聂、蒯的案不能翻。

1978年

3月22日 上午9:55——10:35，邓副主席约见方毅、蒋南翔、刘西尧及北大的周林、高铁、韦明、汪小川，谈北大工作。邓副主席问，北大的运动怎样？有人反映冷冷清清。聂元梓现在怎样？（周林答：她要翻案。）她有什么可翻。聂元梓，为什么你们不批？这个人至少应该开除党籍，调到别处去劳动。她有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康生说王八蛋也要支持嘛！

4月1日 市委批准将聂元梓、孙蓬一及打人凶手贺彦生三人隔离审查。

4月7日 校党委向市委报送《对孙蓬一的审查及处理意见报告》。《报告》提出将孙蓬一一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并建议依法惩办。

4月8日

下午，校党委召开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大会，大会由党委副书记高铁主持。中文系教员成美，经济系教员杨勋，生物系党总支书记胡寿文，西语系教员郑培蒂在会上发言，揭发聂、孙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暴行。

4月19日 学校召开全校教职员工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大会。……在会上揭发、控诉的有：华东师范大学代表夏鹤令，我校生物系毕业生、湖南临湘县572分校教员樊立勤，地质系教师王永法。党委副书记韦明在会上宣布：经上级党委批准，决定开除聂元梓、孙蓬一的党籍，开除聂元梓、孙蓬一、贺彦生的公职，建议依法惩办。宣布后，由专政机关依法逮捕了聂元梓、孙蓬一、贺彦生。

1979年

8月29日 校党委向中央组织部陈野萍并耀邦报送有关孙蓬一是聂元梓在

“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康生和江青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主要助手的材料。报送原因是王若水将孙蓬一家属的申述以及王若水的意见转给胡耀邦。耀邦做了批示后，学校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孙蓬一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复查核实，写出了上述材料。

请注意，在王若水把孙蓬一的问题反映到胡耀邦那里，并且胡耀邦作了批示的情况下，北大党委仍然坚持原来的错误立场，认为“孙蓬一是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康生和江青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主要助手”。

我要问问当时的北大校党委，你们真的“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孙蓬一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复查核实”了吗？你们敢理直气壮地公布这份上报材料吗？

李清昆老师曾对我说：

周林当党委书记的时候，在东操场召开了两次批聂孙的大会。第一次横幅上写的是“批斗聂元梓大会”，老孙是陪斗。但发言的人总是聂孙、聂孙的，老孙就不停地喊“毛主席万岁！”。当时专案组有井冈山的人，同情老孙，想给老孙递一个条子，告诉他只是陪斗，别喊了。但条子未能递成，会也开不下去了。第二次批斗会，横幅就成了“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大会”。我们站得较远，听不到老孙的喊声。后来听专案组的人讲，公安把老孙的下巴卸掉了。

1996年孙蓬一逝世。向老孙遗体告别时，哲学系派了两辆大轿车，知道消息的好多人都赶来参加，其中有不少是井冈山的朋友，那天我去了，王若水刚刚动过手术，他也去了。总之，大家对孙蓬一都很同情。

孙蓬一不只是反王、关、戚、反谢富治，还反康生。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王、关、戚的后台是谁，那时没有说陈伯达，分析来分析去，就认为康生是王、关、戚的后台。说孙蓬一追随康生，那是颠倒黑白。

孙蓬一从1966年下半年回校参加运动，到1968年8月19日工军宣队进校，仅仅两年的时间。他炮打过谢富治，他和王、关、戚作坚决的斗争，怀疑康生是王、关、戚的后台，他坚决保卫周总理，他遭到陈伯达、江青等人的点名斥责，他坚决抵制迟群之流的邪恶作法并受到迟群之流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当然，

他也确实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些甚至是很严重的。他对自己所犯错误深表痛心，并已做过多次检查。

孙蓬一从小就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热爱党，热爱祖国，在各项政治运动中，都积极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他紧跟毛主席，无限崇拜周总理。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我感到悲哀和无语。

1979年8月14日，孙蓬一的家属写了一份《对孙蓬一问题的询问和申诉》，现引用其中的部分内容：

（二）孙蓬一从1966年下半年回校参加运动，到1968年以迟群、谢静宜为首的“宣传队”进校以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上当受骗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对此他已做过多次检查，并多次向亲人们表示痛心，愿意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而他早在文革初期（67年）就反对谢富治，继之又反对王、关、戚和康生等人；坚决保卫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老师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后来又在实践中逐步认识了“四人帮”的反动嘴脸（这些是他经常与我们亲友谈论的，而且有当时大量书信为证，大量事实可查，同时也是他周围的人们所熟知的。）。正因为此，早在1967年，他即遭到陈伯达、江青之流点名斥责，并因此遭到批判、抄家、通缉，被打成“二月逆流派”、“老保”、“右倾势力代表”以至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尤其1968年迟群、谢静宜之流进驻北大以后，他一直被打成反革命而被长期隔离审查，批判斗争、劳动改造。不仅要定他反谢富治、康生之罪，而且说他反陈伯达、反林彪，以至公开威胁说：“若不老实交代你反林×的罪行就再也听不到《国际歌》和《东方红》了……。”直到“四人帮”被粉碎，辗转折磨长达八年之久，因此他对“四人帮”恨之切齿刻骨，从而也就更加悔恨自己文革初期上当受骗所犯错误，每当我们谈及这些，总是慷慨激昂、悔恨交加。

此外，他对邓副主席，在文革初期，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曾在一张大字报上签过名；但是后来他的思想却有很大变化，尤其是自邓副主席重新上台以后，他从内心敬仰、爱戴与拥护。1976年在“四人帮”甚嚣尘上掀起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之时，正处在受审查地位的孙蓬一却断然拒绝了当时“宣传队”派人登门诱迫他参加所谓“批邓”的可耻阴谋，并通过各种方式向亲友们

揭露“四人帮”的反动野心、批判他们的反动文章直到投身于“四五”运动的洪流，这也都是有大量事实为证的。粉碎“四人帮”后，他更是到处向亲友写信宣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宣扬邓副主席的治国主张，把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都寄托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把孙蓬一在文革初期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所犯的一些错误定为“反革命”罪，甚至把他说成是林彪“四人帮”在北大的帮派体系代表，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不公正的，也是作为了解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部思想演变过程、全部实际表现的所有的人所难以接受的。

（四）孙蓬一被捕的背景是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以后；在他（我们）欣喜若狂和所有熟悉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惨遭“四人帮”迫害八年的沉冤有了出头之日的时候；同时也是在党的“十一大”通过了新党章、五届人大通过了新宪法之后。他被捕的过程是：1978年4月3日北大党委派人来到家里，以党委主要负责人找孙谈话为名，让孙立即回校。孙信以为真，认为是要为他澄清问题了，因此饭都顾不上吃，便欣然跟来人立即返校。然而他却万万没有想到回校之后却根本没有任何负责人谈话，而由几个素不相识的人空口无凭地宣布对他实行“隔离审查”。孙蓬一强烈要求找校党委负责人谈话竟被置之不理，也不许申辩。后又给校党委写信并要求将信予以公布和转送中央，也被拒绝（这时并未宣布是敌我矛盾）。4月8日突然召开全校批判大会，给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逼其低头弯腰。4月19日他的姐姐从千里之外的宁夏银川专程赶到北大询问弟弟情况，竟遭蛮横对待。接着就以开批判大会为名，将孙拉到群众大会批斗，并当场宣布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开除公职”逮捕入狱。

另据我们所知，在逮捕孙蓬一的时候，对他的定罪材料并未认真核实，许多材料还是沿用了“四人帮”对孙蓬一的八年“专案审查”的材料。

孙蓬一终于被彻底打倒了。一个和“四人帮”做过坚决斗争的人，在打倒“四人帮”的口号下被打倒了。基层的领导干了什么？法院干了什么？最高领导干了什么？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呜呼！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

2015年7月 于宝鸡

【述 往】

北大汉中分校琐忆^①

陈金松

我于1962年9月-1968年12月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放射化学专业读本科。原定计划6年制于1968年7月份毕业，由于搞文化大革命却延长至1968年12月底才毕业。

1967年2月还是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北京大学汉中分校(位于陕西省汉中市)正在建设期间，建校的冶金部直属某建筑公司的工人先是自身分成两派群众组织，后来其中一派群众组织垮台后，又介入了汉中地区文化大革命两派斗争。北京大学总部原来派技术物理系一年级学生(1965年9月入学的)到汉中分校一边上课一边看守分校校园，并保护当时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他是力学专业，原来就分管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又是党中央、国务院内定北京大学3名保护对象之一。为了避开当时北京大学总部混乱局面，他就被派往北京大学汉中分校。

建设汉中分校是遵照中央的部署。1965年中共中央指示要准备打仗，把我国西部地区称为三线，把一些重要大学和骨干企业迁到三线，北京大学计划第一步先把保密的系或专业——技术物理系(学习原子能科学技术的)、无线电系与数学力学系中力学专业迁到分校。因为1980年中共中央改变了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取消了三线建设部署，北京大学也取消了汉中分校，上述计划也没实现。

由于一年级学生年轻又不熟悉党的政策，而我们四年级学生年龄稍大点，又经过社教运动锻炼比较熟悉党的政策，所以学校总部决定加派我们系核物理专业四年级学生去汉中分校。后来据说中央有个通知，中央领导干部子女不要介入地方两派斗争，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当时是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四年级学生，而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师生已介入当地两派斗争，于是学校总部又把整个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四年级学生都撤回北京，而换上技术物理系放射化学专业四年级学生。而我正是这其中之一，所以也被派往汉中分校。

我是1966年12月从北京返回福州看望病重父亲。后父亲病故，待我处理好丧事约1967年2月10日返回北京。还有几位同学也因故没赶上和我们班大部分

^① 作者1944年生于福州市，退休前为黑龙江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同学去汉中分校，所以我们余下几位同学一起立即启程跟去汉中分校。到了汉中火车站，从汉中火车站到汉中分校还很远，当时没有公共汽车，由敞篷卡车接我们到汉中分校。那时还是冬天，寒风凛冽，好在我们都是20多岁的青年学生，身体都可以抗住。

一到分校，由何以堂老师(北京大学生物系的，留学苏联，当时任汉中分校行政干部)给我们介绍汉中当地文化大革命情况。他说北京大学学生到汉中地委公安处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该公安处干部尚德俊介绍情况时，其言论有重大问题。我们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支持的这派群众组织要揪他，但另一派群众组织要保他。两派群众组织对立着展开斗争。我仔细阅读了尚德俊录音讲话稿，觉得谈不上反革命言论。但是我只是一位普通大学生，无力改变当时的状况，所以我一想，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于是我起草了一份给当时北京大学汉中分校领导的报告，报告中心意思为，1967年初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指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现在，大学生不要再介入当地文化大革命运动，否则就要帮倒忙了。根据此讲话精神，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师生不应该介入当地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管历史上对陈伯达如何评价，这讲话今日看来还是对的。起草好这个报告，我们几位同学一边传阅，一边讨论，一边修改。此时同学中出现不同的意见，即不同意我们的看法，甚至有的同学没经我们同意，就把报告草稿送到北京大学汉中分校负责人处。有一位参加讨论的同学知道后非常生气，他说阶级斗争搞到我们同学之中来了。我当时倒无所谓，因为这些观点我并不想隐瞒。最后在这个报告签名的有：丁治元、秦铁民、陈金松、郭亮天、徐仁祥等5名同学。

当时北京大学汉中分校负责人是中共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戴新民。她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位司长，9级干部，其爱人是当时国家计委副主任宋绍文，她因涉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泄密案，受处分被下放到北京大学。她看了报告后只说，报告没肯定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师生参加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她殊不知，正是我们对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师生参加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有看法，但是我们又惹不起他们，所以干脆就不提此事。事后我们得知，戴新民用长途电话请示了当时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聂元梓，聂元梓说，如果他们愿意回北京就让他们回来吧！

我们班第一批从汉中分校撤回的有：丁治元、秦铁民与我3位同学。从汉中分校到汉中火车站学校派一辆卡车送我们。班主任金天柱老师送我们上卡车时对我们说，你们班绝大部分同学都留在这里，你们就舍得走了？我当时回答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引自毛泽东的话，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引用毛泽东的话）火车经过宝鸡火车站时，我还买了一只烧鸡3个人一起吃，庆贺我们抗争的胜利。

1967年6月在北京的我们班有些同学参加北京市郊区麦收，当时主持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孙蓬一老师，代表学校领导去看望我们。我上前和他说，参加汉中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北京大学师生应该撤出。他说对。于是我心里更有底了。

实际的情况不幸被我言中。汉中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先是出现低级化、庸俗化。例如，我们班一位女同学刻蜡版把“毛主席与他亲密战友”刻为“毛主席与它亲密战友”，结果对立派要揪她，当时居然有人同意交出。幸亏查出原文来自《首都红卫兵报》上也是这么写的，才得以幸免，否则后果可想而知。又如，我们班一位男同学到汉中某文艺单位串联时遇到如下情况——两派群众互相揭发对方生活作风问题。一位女同志居然对该男同学说：“我搞得最少，才两个男的。”言外之意，她的生活作风问题不大，还比较正派，应该是依靠对象。事后我们听说时都捧腹大笑。

4月14日，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师生支持的群众组织到专区公安处静坐绝食，要求按“现行反革命”批斗尚德俊等。汉中分校师生参与了绝食斗争，绝食时用高音喇叭呼口号，唱歌曲——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万岁！“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耐雄那尔，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等——口号与歌曲都不错，只可惜被玷污了。我们班一位同学饿得实在受不了，中途还偷跑出来吃东西，被人看见好不尴尬！绝食静坐对公安处压力很大，在军分区的协调下，第七天被劝阻罢坐。

1967年6月起，两派在揪抓、夺权中，观点分歧，由激烈辩论，互相攻击到互骂互打，开始用石头、棍棒，小范围磨擦打砸，进而不断升级，继之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真枪实弹相斗。观点不同者，在辩论、揪斗中势不两立。1967年7月初，两派以石头、棍棒多次武斗后，气氛紧张，武斗人员不敢在本单位住宿，开始集体过夜。8月17日，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师生支持的那派群众组织有

一名学生被打死。8月19日12时25分，由该派某头目指挥，在汉中城北汽车站，用一辆汽车为掩护，将炸药运至对方占据的汉中汽车运输公司新建的一幢三层职工楼前，一声巨响，楼房炸毁，32人粉身碎骨，伤30多人，其中致残4人，重伤9人，为本地区“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大最惨的事件。

接着出现大规模武斗，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师生卷了进去。一天晚上，我们班一位同学与本派一位群众坐在屋里，突然一声枪响，那位群众应声倒下。我们班那位同学因为没坐窗前，所以倒下的不是他。吓得他第二天就返回了北京。于是许多同学包括金天柱老师都陆陆续续地返回了北京。一位较早返回北京的我们班女同学在大饭厅碰到我时还对我说，让历史来验证你们（指在该报告签名的人）的对错吧！应该说后来他们能够顺利地返回北京，没有受到伤害，是得益于我们那个报告的。

何以堂老师也回到了北京，但是在1968年12月北大开展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跳楼自杀身亡。何以堂老师当时不到30岁，政治上也是极其不成熟。有一次，一年级一位男同学与对方派别群众辩论时发生推搡动作，对方说我方打了人。当那位男同学回来汇报时，何以堂老师问他打人了么？何以堂老师的眼神告诉他，应该说没打。但是那位男同学才19岁，比较老实，喃喃自语地说，打了。何以堂老师立刻说，嗨！打人决不能承认，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我们当年留苏学生到列宁墓前送花圈，打了xxx就说没打。

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师生支持的那派群众组织某头头也被枪毙。这个造反派很色，看到某位漂亮的女同学戴着毛主席像章上去就抢，名曰抢像章，实是摸胸脯。1968年9月该群众组织头头还到北大看望过我们班有些同学，大概是探听风声，但回去不久后就被逮捕。

这段生活已经远去，但是我们从中可以悟出，一个人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精神，陈云有个九字真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也是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作为“五四”运动的传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五四”运动的精神——科学与民主！

如今我们同学都已达到70岁以上，在人世时间已经不多了。写这段回忆不是在争论谁对谁错，谁高谁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都参加了，都听了毛泽东的话，都犯有错误，都是受害者，都不可能一贯正确。如今如果再去争论当初谁

多一点错误，谁少一点错误，也没有什么意义。当年出现那些事也只能说明，有些人成熟早一点，有些人成熟晚一点，成熟晚的同学可能被“左派”蒙蔽而已。

我们这代人行将离世，如果再不及时总结这段历史，不吸取教训，文革或类似文革事件还可能重演，那么我们这代人就是对后代人不负责任！当然回忆文章主要对事不对人，对涉及到消极事件的人要尽量含糊，以免影响团结。同学之间应该以和为贵吧。我们今天要提倡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把这作为共同财富留给后代。薄熙来事件应该给我们全国人民敲起警钟！

2015.8.14 定稿

【随笔】

非常年代^①

刘若

1、给张承先通风报信

文化大革命开始，突然间这个世界一切都变了，革命的迅猛态势令人目不暇接，一切似乎都进入非常状态。学生不上课，老师不教书，校内体罚、批斗、打人的事频繁发生，还有人自杀。这是怎么回事？1966年变成了1927年？当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形势卷土重来？中央派驻工作组进校也不能阻止事态的发展。正在疑虑中，6月18日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讲话，铿锵有力，顿时校园鸦雀无声，从此平静了许多。但是没想到未名湖水又起波澜。

7月中旬江青等人到北大煽风点火，说什么：“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走开！”7月25日与26日晚中央文革在北大东操场开全校师生大会。会上控诉、批判张承先工作组。张被押上台，会上还有中学生慷慨激昂地批张，有人解下皮带向张抽打过去。他们哪儿来的这么大的仇恨？



江青在这万人大会上怒斥中文系张绍华与毛岸青谈恋爱。说什么：“我们坚决不同意！”当年的新婚姻法原来只是宣传而已，如果中国的第一家庭还是父母包办，那别的家庭呢？

(2004年8月20日，张承先为烟台大学建校20周年题词。左一为朱慧)

在细细的小雨之下，人们惊愕了。我和叶惠青在焦虑中想要上告毛主席。看看台上就座的有朱德爷爷，我们决定给他写张纸条。条子是这样写的：“敬爱的

^①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无线电系1961级学生，“刘若”是作者的笔名。

朱老爷爷，我们急切想见到毛主席!!!望您替我们转达。致以革命敬礼!”我们一直盯着条子往前传，最后是李讷接过去的。一个个讲话、揭发、批判……直到最后才轮到朱老总讲话。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朱老总话还没讲完，台上的人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个个都退场了。看着年迈的老总孤零零站在话筒前，我们不禁泪水夺眶而出。心想，那张条子毛主席肯定是看不到了。

后来我和马正颜去38楼找技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邓朴方，讲了我们对中央文革的不满，让他转告他爸爸，我们想见毛主席。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我俩的姓名和我们所在的15系（15系为无线电电子学系——作者注）。没想到几天后，他父亲就是二号走资派了，梦幻再次破灭。

运动甚嚣尘上，文革转为武斗，多处拉出人就斗。低头、弓腰、戴高帽、挂牌子、拳打脚踢、吐口水……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迅猛。天要塌下来了。

我把张承先被批斗的事写信转告父亲，当时父亲在天津任省轻化厅工作组组长。我想让他有所准备，工作组长会有如此下场。父亲与张承先夫人朱慧在一个单位，便立即把此消息告诉了她，她说：“绝对不可能，我前天还和他通电话呢。”

爸爸把我的信拿给她看，她急坏了，马上给丈夫打电话，此时此刻已经接不到对方的回音了。

她曾对爸爸说，我的那封信犹如晴天霹雳。

后来我去过他们在北京的住处，一进屋看到一个24史专用书柜。奇怪，运动中“破四旧”搞得天翻地覆，他们这个柜子竟然完好无损。所以说文革就像打游击，扫到哪里，哪里就玩儿完，扫把不见得扫到每个角落。

在他们家我讲了许多小道消息，爸爸怕出事总打断我。朱慧说：“我们应该多听听青年人想法。”我还把去其他老干部家，比如：李洁伯、李一夫、陈大远、王涛江、杨冠飞、胡愈之、严景毅等等的所见所闻一一抖落出来。其实他们都感同身受。在我讲到第一次去王涛江家，一开头他就说他被批斗了328场。张承先惊愕地目视其夫人，我想：他大概是想说：

“我被批斗了多少场？”

2、大字报

1966年7月末，文革小组一伙人的表现大大出人意料。江青、康生极尽表

现之能事，随意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后来去党校看大字报，大字报揭发了许多康生的历史问题，看后大为震惊。而转天再去看，揭发者全部被康生打成叛徒或特务……

康生是文革小组顾问，怎么会有这样的中央首长？

毛主席怎么就看不透这个大奸臣呢？

我当时住在北大学生宿舍35楼，实在忍不下去。一天我躺在宿舍的上床，愤愤地说：“我要跳出来了，我要贴大字报，揭露康生这个大阴谋家。”此时全宿舍的人都下了床，齐声说：“你可别这么做呀！否则我们就都成了反革命的同学了。”我强压下去没有跳出来。

贴康生大字报的想法曾对孙蓬一说过，他一点也不奇怪，不过他说：“先别轻举妄动，另外你还没有做好面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的思想准备。等等，再看看。”

这一压，这一等，整个文革中一张大字报也没写。没写大字报，还被贴了一张大字报。

文革初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可以停留目视的墙面，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都贴满大字报。后来学校立了许多木桩，连上竹席，构成了大字报席墙。

我从天津家里弄来一辆自行车，可以坐在车的货架上看和抄大字报。还可以骑车在北大、清华、人大、党校等处随意转悠。大字报从学科上分得很清楚，最好看是理工清华，非常活跃，没有长篇大论，有时还夹杂着漫画。北大次之，最郁闷的是人大的，多是长篇大论。

当年贴大字报犹如今天网上发帖，内容五花八门，揭发中央、地方乃至基层领导。有组织问题、工作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等等。

一天看到38楼东侧贴了满墙大字报，是我们年级同学写的，揭发年级辅导员。其实该辅导员就是比我们高两级的学生。看完感觉不可思议，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小题大做。当时，一位同学对我说：“你怎么不写大字报揭发呀？”

“写什么？”

“揭发领导问题呀。你把他们的问题揭发出来呀。”

“他们最多是工作方法问题，就是有错误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贴什么大字报啊。”

“你这就不对了，这次运动就是这么个搞法。你揭他们，他们再往上揭，层层上揪。你还是快写大字报吧。”

我无语了。没想到转天从第二教学楼出来，看到地上有一张写有我名字的大字报，题目是《踢开运动的绊脚石》。其中点名道姓地说：“现在刘 XX 还在强调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在说 XXX 是人民内部矛盾。她这是……”

当我看到这张大字报时的确有点紧张，这场革命革到我头上来了。不过我没有动摇，依然一张大字报也不写，还把他们的大字报偷偷抄下来，传给那位辅导员。

3、刘邦杀韩信

1966年8月初的一个夜晚刚要睡下，听说大饭厅前贴出毛主席的大字报，马上爬起来去看。红纸黑字。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看完以后的感觉难以形容，这个世界一切都变了。分明这是毛主席写的，那语言，那气势，是他老人家的。可是毛主席为什么这样看学校的文革？这50多天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的恰恰是江青一帮人呀。1962年与1964年又是怎么回事？

很明显毛主席是朝刘少奇来的，原来党中央是这个样子啊！伟大的领袖们之

间的矛盾是如此地不可调和呀！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怎么了？以前所听所闻所学都是假的？文革初，叶帅说：文革是一场演习，预防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老百姓该怎么办。看来，叶帅也没有搞懂毛主席，毛分明是动真格儿的了。



（上图：父亲在干校）

以后将怎么走？从大饭厅走向宿舍，一宿没睡，忧伤至极。第二天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爸爸。爸爸也说这肯定是毛主席写的，爸爸又对我讲了讲1962年与1964年四清的事。

最后爸爸说：“这就是刘邦杀韩信。中国历史就是这样。”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底稿在北大展览过。最后一段和三句口号是聂元梓加的。当时很奇怪，搞运动，摆事实讲道理，喊什么口号！后来，很后的后来，我问聂。想不到她的回答是：“那个年代长期以来我清楚地知道，对于中央精神，我比传达者理解得还透彻。《五·一六通知》一传达，我就知道党中央，毛主席有了危机。”

那张大字报至今我也没有读过，读不下去。

4、破四旧

当年抄家，砸东西，毁文物大行其道。那股风怎么刮起来的？我一直认为有幕后推手。

跟风，我和一些同学去北京市委，到了范瑾的办公室，里边的东西随便抄。那时我还没有转过来，一张纸也没拿，回来有点后悔，怎么没顺手揣两本书呢。

后来大街上常遇到乱斗人的情况，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是某小学校长，被剃了头，跪搓板，受了不少罪。

一天，大姐的同学刘文雅从清华来，愁眉不展地说起社会上的乱象，忧国忧民，心情沉重。我对他说：“你愁什么？贴你大字报，斗你两下又怎么着？抄你家，你家里有什么？有金条吗？咱就等着瞧吧。还能折腾到哪儿去？”没想到这场运动就像翻烙饼，翻过来复过去折腾了十年之久。

城内大街上到处在砸牌子、摔东西，正为这莫测的风云不知所向，回到学校

却听见大喇叭广播：“红卫兵小将们——赶紧起来保护北大文物！”噢，原来是聂老佛爷。

后来陈葆华老师对我说，北大图书馆的书几乎一本也没有损失。此外听北大保卫组谢甲林、周俊叶讲文革中如何保护北大文物与知名学者，其复杂、曲折与艰难令人惊叹！而今这可能是文革史研究的空白。

后来听弟弟说：当年批斗爸爸时，戴了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大牌子，不断地喊着打倒的口号，专门在家楼外绕了好几圈。奶奶知道爸爸被批斗后，非常生气，大声喊：“啊，斗我儿子？敢！不就是毛泽东么？”



当时一伙人来家里抄家，妈妈非常配合，书柜、（作者与谢甲林。2013年）大衣柜都打开让他们搜。还主动从床底下拉出来几个箱子，里边装的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翻翻看问，可能因为土太多没往下翻。谢天谢地！下边放着几幅日本名画，如果被发现的话，罪过可就大了。妈妈还把修理自行车的工具箱也拉了出来，让他们查。那两个人可能看这家搜不出什么东西来就走了，侥幸他们还算手下留情。对面那家可惨了，进去就翻箱倒柜，搜个底儿掉，还用刀子把棉被划个大口子，看看里面是否有东西。

家里被抄是很长时间以后我才知道的，不禁在想，我在北京本应该是抄家一族，没想到自家却在被抄之列。

5、派

文革中派别是怎样形成的？所谓的保守与造反是怎么回事？一个宿舍大都分成了两派，两派阵容并不是按以往的观念、印象形成。过去的班干部、甚至党员与过去认为落后、被整过的同学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有些平时一言不发的人现在变得十分活跃。这个时期千姿百态。

当时随便成立组织，战斗队林立，红卫兵遍地。随意发表宣言、声明、宪章、抗议书、公告。几乎所有人都卷到运动中，各属一派。我没入派，也没当“兵”。

因为感觉跟着中央文革走，哪怕只是他们的传声筒，跟屁虫，你就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了，不情愿。但并不逍遥，自称是一个人的独立战斗队，走访两派收集资料，与文革同步考查研究，不要等多少年后再挖掘，再追述。开始还有同学和我一起，我们在两派组织中穿梭走访。一天我和马正颜去数学系学生宿舍楼走访《虎山行》战斗队队长。他不在，我们说过两天再来。但是两天后，这位学生就被压上台挨批斗了。

其实保守派更具反抗精神，因为当时造反是唯一正确的，“造反有理”天经地义。后来已经无所谓造反与保守。最活跃的都是从造反派中分裂出来，又组成各个派别，大多都有后台。夫妻各属一派，一家分两派也不在少数。我弟弟和妹妹在一个单位，弟弟是保守派，妹妹是造反派。

一天晚上弟弟写大字报，写一张，贴一张，顺便就让妹妹去贴，共写了五张。第二天一早人们发现这份大写报很奇怪，三张字是正的，另外两张字是倒着的。弟弟说是因为妹妹贴大字报时慌慌张张，恐怕被她自己那派的人看见。我开玩笑说：“那是因为她和你不是一派。成心！”

文革与现在的网络又有一比，战斗队的成立就如同现在的论坛、QQ群之类的吧？

当时说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这一断语，耐人寻味。这是提示人们对立面就是国民党？还是说国民党不过是一家人分两派？此外，西方的两党、多党是不是也就这么形成的？以后两党并立在中国是否会永存下去？

文革初，父亲还没被查时，一天他来北京，说是去看望一位老同事。我们在北京南城转了好久，父亲突然对我说，你就在这里等我，我一个人去一个同事家，一会儿就回来。说完父亲转身就走了。过了好一阵子，父亲走过来，后边跟随着一位老者，父亲转过头让他回去。他就停下了，目视我们转弯才离开。后来父亲告诉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很大程度是受他影响，他借给父亲许多书，比如《莫斯科印象记》、《共产党宣言》、鲁迅文集等等。父亲后来加入共产党，而他因为日语好，当了日本翻译。父亲说：“他当日本翻译时，做了许多好事。比如他建议不要到处烧杀抢掠，所以我们家乡相对破坏比较少。”

但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党员，所以解放后被捕入狱，后来一直没有工作，靠其夫人养活。此人叫刘晓仲，那天父亲去看他，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

现今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大多是当年中小學生。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一线大学生和教师呢？可能是因为后者元气大伤，死的死，伤的伤，各种压力使得他们不敢写、说、想。而那些中小學生没能真正深入其中，所以不知深浅，以至长年保持着对文革的亢奋状态。而且后来大多出国留洋，见多识广。他们是从全球历史眼光分析研究，这固然使得理论上能够得以深入，殊不知其实他们一直与真实有着差距。

6、大串联

一. 大形势

当年文革与现在网络的又一比：就是大串联。现在键盘上点哪儿是哪儿。文革时，我们是乘汽车、火车、轮船游遍大江南北；可惜没能坐上飞机和火箭，也很难出国。全国所有大中小學生可以随便去国内任何地方。乘车，住宿，吃饭不花钱。现在无论哪个国家，哪一届领导敢试试？

大串联之风一起，学校几乎走空。有去工厂，去农村的；有去外省市的，还有的出了国境。乘车的人太多，经常出现上不去，下不来，开不动的情况，顺势开始了步行长征。我一个弟弟是乘大货车从天津去了乌鲁木齐。

最初我想坐阵北京哪儿也不去，我的同窗好友叶惠青邀我去韶山。好吧，出发。1966年8月18日正当全国学生来北京朝拜的时候我俩南下。

二. 南下

背了书包上火车。在车上双脚站立都很难。有人坐到货架子上，我干脆躺在车箱里的座位下面。这样不被人挤，不被人踩。

火车每到一站，都有人上车，许多是从窗户爬进来的。晃晃悠悠终于到了韶山。但是我们没下车，下不去！所有的车门、窗口都被上车的人堵住了。没辙，只好随车南下。

一直把我们拉到终点站广州，

下了车直奔中山大学。每天我们都去广州的一些大学看大字报，要材料。一分钱也不花在那里吃住了七八天。下一步去哪里？反正已经到了广州，再去广西桂林吧，那可是甲天下呀，毛主席说了游山玩水也是可以的。于是，向西挺进。

三. 西行漫记

告别了中山大学乘火车去桂林。全国一盘棋，这一路依然拥挤不堪，到了桂林下不去。唉呀，这甲天下是什么样子啊？想从车窗伸出个头看看，无奈窗户都被往里钻的人挡住了。只好听凭火车的支配，一直把我们拉到终点站——贵阳。

我们住在贵阳一个工厂里，工人们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两派都主动给了许多材料。我们想去贵阳的学校看看，问他们坐什么车，他们说：“全市就一趟环城汽车，走去也没多远。”后来我们绕全市一圈，也就北大加清华那么大小。住了两天，调查研究了一番，原来都市、省会可以这么小啊！转不开身，走吧。下一步到哪儿去？去韶山不成，去了广州；去桂林不成，来到了贵阳。下边我们就继续西进吧，便乘车去了重庆，干脆上的是贵阳直达重庆的火车。

重庆是个山城，高高低低的很有味道，有许多景点，而当时都是四旧不开放，路也不知道怎么走，我们只好随大流去了碴子洞、收租院。当然四川大学是必去的。

那些天阴雨绵绵，爬山摔了一跤，裤子太脏，当晚洗了，一天也不干，怎么办？惠青花十元钱买来一条新裤，这是我们出发转了大半个中国唯一的一笔开支。当时学生串联只管乘车与吃住，没说管穿呀。有了裤子，我们又出去串联了。

四. 打道回府

在重庆住了十来天该回去了吧，可是还没有玩够，汽车、火车都坐了，还没有坐船呐，乘船到武汉吧。一条大船缓缓地行驶在江面。一个人不禁感慨：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马上收起，还左右看看，怕人说他四旧。

武汉是汉口和武昌由江水隔开，是水城，重庆是山城。祖国之辽阔，内容之繁多，不出去串联哪知道啊。

转眼出来一个月了，于是我俩打道回府。没想到去北京的人太多太多，怎么也挤不上去，恰巧有人推了我一把，火车就开动了。一回头惠青还在下边，她是乘下一班车回来的。

这一路我收获了大包大包的运动资料，而惠青从始至终手不离英语课本。我们刚走进校园就听见聂老佛爷又在广播，让大家不要再出去串联，回校复课闹革

命。听她这么一讲，呼啦！几乎走光了，因为这是个信号，以后可能不让免费串联了，叶惠青第二天就去了上海。

1975年5月15日我终于到了韶山。看到路旁有许多树，开小白花，香气袭人，问当地人：“这是什么树？”听到他们说：“城里人只知道吃橘子，不知道橘子长在哪儿。”

初到韶山

绿水，红山，细雨，

清风，黄屋，香橘，

英雄，史篇，词曲。

万物谁卜？

池塘边，我独语。

7、点点滴滴

一. 入党条件

运动初期看到一张大字报，写的是一位女同学积极申请入党。后来年级党组织委员找她谈话，意思是他看上了她，如果她同意和他搞对象，就发展她入党。她没看上他！所以直到文革开始她也没入成党。

啊？！党，原来可以这样入啊！

我写过一首打油诗《我很傻》，说到我以为所有的人都要入队、入团、入党。所以我在大一就写了申请，以为18岁就准入党了呢，到大六还没有入成。我在想如果这位组织委员看上我的话，他是不是也会对我那么说？我的天！

不禁在想：其他入了党的人，是不是……还是别想了吧。从此彻底退却了。

二. 风云变幻

运动一开始许多人觉得这不是右派翻天了么！五七年的风又要卷土重来。让他们表演吧，下一步就该抓右派了。但是很快人们发现过去那一页一去不复返了，而今恰恰相反，现在是反领导，反过去天经地义。东西风不变，左右可逆转。

在一次小范围批斗会上，台下被打的人说：“饶了我吧，我是贫下中农子弟。”

“现在打的就是你们这些贫下中农子弟！”台上的主审说。接着问：“你说

不说？不说？”然后手一挥，下令：“打！”立刻几个人过去拳打脚踢。

目睹这场景，我鄙视被打者，抵触主审与打人者。

走出那个房间，感到回肠九转！那位主持批斗者的眉目、表情永久刻录在脑海里。我在想：这之前多年来他是怎么度过的？他一直强忍着，积压着愤恨。文革来了，他以为天时地利已到，火山骤然喷发。

不过这股风非常短暂，似乎没有几天“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势头就弥漫开来。那位主持一定是“混蛋”窝里的，后来呢？

三. 真真假假

又斗人了，快去看吧。大饭厅人已满，台上两边也都坐了许多人，我便挤到台下紧挨主席台旁，侧着身，举着头，看和听。A派的主持大会。B派的一位学生发表了反对文革的言论，那还了得！现行反革命！他弯着腰90度，接受批斗。批判发言，口号声不绝：“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打倒反革命！”“老实交待！”“低头认罪！”

突然在台上旁边坐着的一位学生冲了过去，朝那位被斗的同学拳打脚踢。这时期已经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打人已经不得人心，因此全场哗然，尤其是B派的人此时把斗争矛头直指A派主持。

就在这关头，那位主持一把抓住那个打人者，问他是哪个系，哪个班，叫什么名字？此时台下好几个人喊起来，指名道姓说出打人的人与被打者是一伙的。

这一幕，给对立派抹黑，可谓现代版苦肉计，自导自演用心良苦。这出文化大革命的戏，其曲折复杂程度登峰造极。

2002年在美国曾与高文谦联系，希望他不要发表他的《晚年周恩来》。当他说他写的都是亲眼所见时，我用此例说明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也不见得是真的。当然我还举了多个例证。

四. 是谁吸了战士的脊髓？

文革初，在校园大饭厅南墙贴出一张大字报，文中写到解放军战士入伍以后，体检或生病时有时要抽脊髓化验。往往是多抽许多，用去化验的仅一点点，其余的供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甲某饮用。当然他还有其它许多罪行，什么

“三反分子”、“定时炸弹”等等。甲某被罢了官，林彪指定另一位官员乙某接替。

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乙某与林彪自然脱不了干系，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并被关押。而被揭发吸战士脊髓的甲某立即接替乙某恢复官职。

当年的同学聊进来：“甲某不是吸战士的脊髓吗？怎么还能起用？”另一位同学似看破红尘地说：“现在吸战士脊髓的不是甲，而是乙了。”

文革对人的触动是颠覆性的。

这里用的甲某、乙某。为什么不用真名？“这个你懂得。”

五. 毛周的博弈

文革中立与破，打倒与树立贯穿始终。1966年6月清华红卫兵“破四旧”砸了清华大学二校门。1967年9月在原地树立了毛主席塑像。清华，北大攀比由来已久。清华这么抢风头，北大也要在哲学楼与二教之间建主席塑像，清华请林副主席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大就去找周总理，总理却说：“我不能提。将来被打倒，还得抠下来。我倒没什么，那样的话对毛主席不恭。”

1967年1月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档案被抢劫一空，由于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对此对抗，郑仲兵被捕入狱。后来郑又因为不同意批“二月逆流”，而且还写大字报说“他们原来都是老师老总，有错误可以批判，但如果一定一个一个都要打倒，不是把矛头实际上指向周恩来了么？”因此郑仲兵被打成“二月逆流派”，遭到围攻、打击。传到周总理那里，总理会怎么说？请读者想一会再往下看！

总理说：“郑仲兵一家子都是坏人。”

谁能想象得到后果是怎样的？？不亲历文革，是绝对无法理解周总理当时的话，以及后来的结果的。

这之后郑仲兵如释重负！因为对立面一下子便放弃了对他的围攻与批斗。这其中有许多关系到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群众组织，公开与私下的极其复杂的内情。文化大革命中类似的阴阳交错，表里反转的事情不胜枚举。或许有一天所有的当

事人直白说出真相，并且档案全部公布，……不过不用期盼，不用假设，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写出来的历史与真实之间是有着难以言说的差距。

文革一开始，毛炮打刘的大字报一出，刘就是个死老虎。种种事例表明，而且总理一清二楚，下一个目标就是周恩来。从始至终周总理是用怎样的智慧，磨难，自残与之对应啊！

不过按说毛反周本来是易如反掌，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抛出来就是了。但是多年来却大费周折，起伏跌宕，反复收放，以至1973年成立“梁效”高调反周。为什么是这样？毛在反周问题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我的一位同学的哥哥是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员，进了“梁效”班子。一天我见到他，毫不客气地问他：“你们反周总理，不怕将来成为千古罪人？”

没想到他听我这么一说，气坏了。他说：“谁说我们反总理了？我们怎么可能反总理呢？这太荒谬了。”

我俩争执不休，最后他妹妹王朝英解围说：“他在梁效只是负责提供资料，不参与动笔写文章，内情他不了解。”

后来她对我说，她哥哥从那以后变化很大。

这件事令我很费思索：这位同学的哥哥是不会说谎的。“梁效”的人竟然不知道他们是文革的御用文人！死不承认他们是在为反总理大造舆论。太蹊跷了！这些精英当年进“梁效”时，“很高兴、非常愉快、特别骄傲、欣然自得、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废寝忘食”；以及后来的“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毕竟是书生”，忏悔、道歉、认错，等等。

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权威学者对政治、对人性竟然是如此地弱智！只是由于个人崇拜？为什么达到这种程度？如今的文化是传统的劣根性还是正在步入堕落？■

【资料】

孙蓬一等人的“一·二七”大字报

最高指示

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林副主席指示

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革命在前进，革命要继续。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现在首都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正在掀起一个坚决批判极“左”思潮，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最丑恶、最阴险的敌人，是无产阶级的最大隐患。这些家伙在反革命小爬虫王、关、戚、杨、余、傅、肖华的培植和操纵下，以极“左”和极右的面目出现，把反革命的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反对周总理，不只是反对周总理，目的是妄图搞垮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周总理几十年如一日，为党、为人民、为革命忠心耿耿地工作。他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党有毛主席是最大的幸福，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幸福，有忠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周总理同样是幸福。因此，反

对周总理实质上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革命，谁反对周总理也是反革命。

“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黑手伸得很长。不仅北京有，其他地方也有；不仅机关有，学校有，文艺界有，部队里也有；不仅高等院校有，北京大学也一定有，而且是“五·一六”的一个重要据点。不妨让我们简单地重温一下我校三年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历史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几个回合的大搏斗，哪一个在北大没有激烈的反映？特别是“五·一六”的后台王、关、戚所掀起的极“左”思潮的泛滥和“五·一六”的反革命活动在北大尤其猖狂。请看，在北大：

早在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时期，就和周英、卢正义、徐非光、谭厚兰、李冠英之流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有；

“五·一六”活动猖狂之时，策划、组织成立北大“五·一六公社”的有；
在“五·一六”头头授意下，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劫国家机密档案的有；
经常向林杰、周景芳、穆欣、洪涛、王恩宇之流请示、汇报，和王乃英特务组秘密联系的有；

直接参加周景芳操纵的“干联站”黑活动的有；

参加“五·一六”骨干分子八月黑会的有；

鼓吹“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的反动谬论，煽动大抓“军内一小撮”的有；

“五·一六”匪团猖獗时期，把北大革命群众张贴的“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的革命大标语，拍成照片，送交“五·一六”匪首，作为“老保”、“罪证”邀功请赏的有；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恶毒攻击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甚至当王、关、戚倒台之后，还为王、关、戚鸣冤叫屈，恶毒咒骂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犯下令人绝对不能容忍的滔天大罪的人有。

仅从以上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难道不足以说明北大“五·一六”分子的活动是何等猖狂吗？请那些闭眼不看事实的人看一看，想一想，现在是到了彻底清算“五·一六”匪团的罪行，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目前，在如何对待“五·一六”匪团问题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

斗争，这里有一个立场问题，站队问题。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就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如果你是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你就会看到，我们同“五·一六”匪团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严重的政治斗争，必须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要“乱敌人，树队伍”，广泛深入地放手发动群众，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集中精力，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通过清查“五·一六”，真正清理阶级队伍，划清阶级阵线，彻底揭露批判王、关、戚，杨、余、傅的反革命罪行，肃清其流毒，灭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威风，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如果你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五·一六”匪团的穷凶极恶的反动本质，那就必然会滑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当了“五·一六”的防空洞，起着掩护、包庇“五·一六”的作用。这样就必然看不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就必然缺乏对“五·一六”的仇恨，不会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无比热爱，就必然不能真正放手发动群众，不能真正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根本问题，其结果必然是黑白不辨，是非不分，敌我颠倒，混淆阶级阵线，长阶级敌人的威风，灭革命派的志气。因此，抓不抓“五·一六”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大问题，是对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抱什么态度的大问题，是站在哪一边的大问题。当前，抓不抓“五·一六”，坚决不坚决抓“五·一六”，真抓“五·一六”还是假抓“五·一六”，是革命和不革命或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水岭。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游移和动摇都是极大的犯罪！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必须复杂一点，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分析一切、指导一切、批判一切。

毛主席教导说：“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林副主席指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周总理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整党中，对真正的坏人不应放过（比如五·一六坏人）”。江青同志说：“‘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这些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为我们规定了抓“五·一六”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必须坚决照办。

同志们，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在我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正确领导下，立即行动起来，打一场围歼“五·一六”的人民战争，不把“五·一六”彻底查清，绝不罢休。如果谁对那些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的反动家伙，不揭发，不批判，不斗争，甚至以种种借口给他们开脱罪责，就是阶级立场问题，阶级感情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同情、包庇“五·一六”，站在“五·一六”一边。有些人至今还不觉悟，这样下去不是太危险了吗？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只要我们认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提高革命警惕，加强团结，共同对敌，随时揭露一切妄图转移斗争目标的阴谋诡计，那么不管敌人多么狡猾，隐藏得多么巧妙，攻守同盟订的多么牢固，我们都一定能把他们统统挖出来。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打倒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坚决批判王、关、戚之流的极“左”思潮！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哲学系：孙蓬一 赵正义 宋一秀

高云鹏 韦全贵

一九七零年元月二十七日

【资料】

孙蓬一的检查及工军宣队的批语

编者按：

这里刊发的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70届毕业生章铎女士抄录整理的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领导人之一孙蓬一先生在文革中写的一份检查。章铎女士对此文稿有如下说明：“这份检查是写在25×20=500的稿纸上，全文共31页。在部分稿纸上，有当时哲学系宣传队魏指导员写的批语（以仿宋体表示），检查的具体时间原文没有注明。根据其内容推断，时间应该是1969年的下半年。另外，文中有些用红笔划去的部分，可能是宣传队的意见，这部分内容用带下划线的仿宋体表示。”

切实记取教训，认真改造世界观， 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

孙蓬一

批语（第1页，指原稿页码，下同）：活思想可谈，但证明你接受了毛泽东思想，提高了觉悟而解决的，决不是那个人给你解决的。

应该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不应突出工宣队，更不应突出我。否则既不符合实际，也是犯罪行为！因此希望你工宣队的一个字也不能提，我的一个字当然更不能提。这不是谦虚，而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魏（签名）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还教导我们说：“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我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

彻“九大”精神，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用主席思想进一步地武装了我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头脑，在短短的时间里，使我校面貌，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一个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的高潮已经形成，革命形势空前大好！

回想自己前一段的状况，感到十分惭愧。比起同志们的进步，自己是大大落后了。

在宣传队领导小组决定进一步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巩固、发展革命大联合入手把运动推向新阶段之初，对这一正确部署，我非但不理解，而且非常抵触。藉口我已经检查过多次了，不想再做检讨。我错误地认为，所以要这样搞，是因为我们在总结工作中，给宣传队领导提了意见，有些意见提的还比较激烈，因此回过头来就想整我们。从私字出发，对在实际工作中早已纠正了“促头头”中的一些不妥当的作法，自己是耿耿于怀。一听到又要搞消除资产阶级派性，我就和“斗头头”联系起来，心里想：前一段搞得我们已经够受的了，还嫌不够，那就来吧！反正我既非叛、特、反，又非走资派，连走资派还要对他们突出一个拉字呢，又能把我怎样，我等着了，豁出来了。

听了“九大”精神和主席、林副主席一些讲话的传达，认识到宣传队的做法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态度仍然还很不端正，还仍然没有跳出小山头的圈子，没有跳出眼前利益的圈子，没有跳出私字的圈子。宣传队从校、系领导同志，到班、排的工人师傅和解放军同志，虽然对我做了许多耐心的思想工作，但是我还是疑虑不消，当时感动一下，过后依然故我。会上不发言，会下发牢骚。不是去想由于自己的错误，给革命造成那么多严重损失，自己应如何在宣传队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迅速改正错误，不然怎么对得起毛主席；而是怨气冲天，陷入计较个人得失的苦恼之中，千悔万悔，悔不该当初当了这份“倒霉的头头”，做不完的检讨挨不完的轰。宣传队的同志，特别是我们连指导员老魏同志，花了大量时间，怀着阶级兄弟的深厚感情，不厌其烦地反复耐心地对我进行帮助教育，才使自己的这种错误情绪有所扭转。开始对自己的错误有了一点认识。

对待宣传队，就是你不找我，我不找你，你不问，我不说。我想看看宣传队，是不是真能做到以热对冷。来自主席身边的英雄的8341部队，真不愧为全国支左的一面红旗，从我们连的指导员老魏同志身上，更使我口服心服。

老魏同志身体很不好，每天起早睡晚，辛辛苦苦地工作。尽管我的态度那样

错误，可是他却是怀着阶级兄弟的深厚感情，多次不厌其烦地找我谈心，做我的思想工作。

六月五日晚，他和连里的其他负责同志步行来到了我的宿舍。这是进校后他第三次到我宿舍里和我谈话。当晚谈到深夜一点多钟，第二天又和我连续谈了一天。前后足足有十多个小时。他先耐心地听我把话讲完，对合理的意见，他当即表示接受，对我的错误思想，他则用主席思想循循善诱地启发我的觉悟，我有了微小的提高，他都以极大的热情给以鼓励，我一时想不通的问题，他就向我指出应该怎样想的方向，毫不强加于人勉强我接受。更使我感动的是，老魏他们还向我作自我批评，说什么他们找我谈话太晚、太少。明明是我疏远宣传队，他们还首先作自我批评。这种对同志、对人民满腔热情的态度，这种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方法，给我的教育实在深刻极了，想想自己过去对群众的错误态度和作法，更感到惭愧万分！自己再不觉悟，再不用主席思想重新审查一下自己的过去，从错误中切实记取教训，认真改造世界观，那就真对不起毛主席了！

最近，老魏他们又多次和我谈心，帮助我分析我的问题。在宣传队的耐心教育下，在广大革命同志的热情帮助下，这些天来，我带着问题学习了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些教导，比起同志们来，自己的觉悟水平还很低，但和我自己以前的水平相比，就觉得有了一点提高，特别是对自己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的错误，有了一点新的认识，汇报给同志们，目的是希望得到同志们对自己的进一步的批判帮助。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的确是很多的，有些是十分严重的。

我校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发动起来的。运动始终都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巨大关怀，这种关怀的巨大，和全国任何一个基层单位相比，都是“得天独厚”。可是，由于我们的错误，北大倒变成了一个“老大难”单位，特别是运动中后期之间，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是搞武斗。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干了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辜负了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全国工农兵群众和全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期望！

从前，我总是强调客观原因，强调北大的阶级斗争环境复杂，强调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强调有许多问题我们也无能为力，因此，一听到比较尖锐的批评，就觉得委屈。其实，正是我们自己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才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

机，导致北大长期分裂和“内战”连绵的局面。

1. 对待孔繁、杨克明同志问题处理上的错误

孔繁、杨克明同志，过去是我们并肩战斗的战友。在陆平时期，我们是长期共过患难的。在和陆平的斗争中，他们的表现一直是很坚决的，是值得我学习的。在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期间的斗争，孔繁同志在斗争中起的作用更大。文化革命初期他们也是很积极的，特别是杨克明同志，响应中央的号召，和其他同志一起，写了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贡献。是张承先和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的挑拨才使我们分裂开来。过去，我总是片面地责怪他们，而看不到自己的错误。其实，在对待孔繁、杨克明同志，我的错误也是不小的。

第一，在分裂之前，我计较个人恩怨，没有主动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多做自我批评，消除分歧，恢复团结。相反，我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同志的事情。有一件事，想起来，现在觉得十分内疚。

杨克明同志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当时我自己的尾巴翘的很高，可是却眼睛盯着别人，认为杨克明同志翘尾巴，对杨克明同志有一股不服气的情绪。有一次，我去中央文革取回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题的“新北大”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当时校刊正等着把题字拿回来制版。本来，我给聂元梓等同志看过以后，就应立即给杨克明同志。可是，我拿到校刊编辑部时，故意先不给杨克明同志，先给校刊的其他工作人员看。当杨克明同志从我手里要时，我有意地给他难堪，说什么：“你抢什么，题字也不是给你一个人题的！”弄得杨克明同志下不了台。好在杨克明同志当时作了克制，不然，那次就要吵起来。想想过去我们并肩战斗的艰苦岁月，想想杨克明同志过去对我的帮助，特别使我记忆犹新的是：反革命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以后，陆平把我们统统赶到乡下，企图在“培养”我们的名义下，把我们赶出北大。我离校的那一天，是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为了赶火车，天不亮老杨就起来给我做饭，帮我捆行李。然后用脚踏车把我的行李直送到车站。临别时，大家怀着对陆平、彭真的满腔愤怒，互相鼓励，一定要坚持斗争，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总有一天要翻身的。我到了乡下后，杨克明同志也写信鼓励我，给我以支持的力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很快得到了解放。可是，翻身之后，我对自己共过患难的战友，却采取这样错误的态度，我确实感到很对不起杨克明同志。

批语（第7页）：孔、杨的问题，整个来说认识还不错，但要害问题没突出。要害问题是：是执行反动路线，还是上当？这个问题没讲清。自己的错误、教训是什么？对被调整下去的人，怎么办？对被为孔杨“翻案”的人怎么办？

第二，六七年初，江青同志对北大问题作了指示后，我们没要认真研究领会。没有把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王任重和张承先，而是指向了自己的战友孔繁、杨克明同志。而且在批判孔繁、杨克明同志的错误时，又不是遵照主席的教导，着重于对产生错误的环境、内容、社会、历史、思想根源的分析，藉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而是过分看重对同志个人责任的追究。

第三，在王任重问题上，我同样也是犯有错误的。我真正看清了王任重的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还是六六年十月中下旬以后，是随着南下串连回来的小将揭发旧湖北省委的问题以后才逐渐觉悟的。开始对王任重分裂革命队伍的反革命两面派的行为，曾怀疑是孔繁、杨克明同志“假传圣旨”，十月初校内出现贴中央文革首长的大字报的歪风时，我把给王任重贴的大字报也是算在其中的。六六年“8.15”大会前，我顶过王任重的秘书长，但那时我并未看出王任重问题的实质，实际上当时主要还是顶的杨克明同志，认为是杨克明同志片面反映情况。后来，在批判杨克明同志时，有的同志说那次是批判了王任重，我也没有公开澄清，这是很不实事求是和缺乏自我批评的表现。

第四，在斗争方法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重地伤害了同志。

第五，在改组校文革时，不仅撤掉了孔繁、杨克明同志，还把支持或仅仅同意过他们某些意见的常委也给撤换了。这种过火的组织处理，还影响到一些系，有些系，当时也批判了所谓孔杨式的人物。严重地损害了同志间的团结。

对孔繁、杨克明同志处理中的错误，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以后学校分裂的根子。因为人们会想：连对孔繁、杨克明同志这些你们过去的战友，有了问题处理起来都如此过火，如果问题发生在别人身上又该怎样呢？况且，我们自己的错误又未向群众公开检查，群众心里当然不服。后来不少人起来为孔繁、杨克明同志鸣不平，对绝大多数同志来说这本来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却不加分析地给人家扣上“为孔、杨翻案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又进一步压制了群众。

2. “井”、“红”问题

“井”、“红”的广大革命群众是好的，是革命的。他们在文化革命初期是

做出了不少成绩的。他们给校文革提的意见，有许多也是正确的。真正炮打中央文革的人，只是极少数，今天来看，这极少数人中，绝大部分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我们在处理“井、红”问题时却存在不少错误。尽管聂元梓同志也讲过几次，反中央文革以上的才能批判，反她和反校文革的不能追究，但总未认真贯彻、执行。结果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据说批斗了二百人。这是严重的错误。应该向所有被错批、错斗的同志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有多少就纠正多少。给这些同志平反。

批语（第11页）：关于“井红”问题，有一个时期你不在家，可能对全过程不太了解。希你研究一番，用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看，就能看清“井红”的本来的面貌，就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就能吸取教训，就能提高自己。

对“井、红”处理中的错误，也是导致大分裂的又一个根子。我们学习班的大字报已经写了，这里就不重复了。

过去，对有些群众为什么对我们那么激烈，往往还想不通。现在看来，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对我们有意见的群众，看到我们对“孔、杨”和“井、红”处理中的错误，为此想到他们的下场，所以一旦分裂出去，就要干到底了。

新北大公社成立时，由于受“孔、杨”和“井、红”问题处理中的错误的影
响，许多地方是以保校文革是否坚决作为入社标准，错误地排斥了许多同志入社，这也是以后分裂的一个因素。

批语（第12页）：这点事实很重要，要揭发。

六七年三月初，校内广大革命群众响应中央的号召，要求校文革整风，批评校文革和主要负责人的错误，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可是我对校文革的错误，当时很不认识，甚至觉得我们比起别的单位来，问题少得多，对群众的这一正当要求，开始是漠然置之，后来虽然同意开展整风，但是由于对我们自己的错误缺乏自觉，就对有的大字报的矛头集中一个人而反感，藉口整风运动是“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的“普遍的”三个字，把一些要求着重整校文革主要负责人的主张，说成是什么“资产阶级整风方针”。三月八日，我在全校大会上，做了一个压制群众革命积极性的讲话，引起了严重的后果。不但大大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使校文革的错误没有得到很好揭露、批判并从而纠正过来，反而整了一

部分群众。

批语（第12页）：郭罗基的大字报应肯定，至于他的动机如何让人家去讲。

四月十三日，我在谢副总理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四月十四日中央首长对我作了严肃的批评。在中央首长的指示下，被迫开展了第二次整风。我对这次整风更无诚意。因为我当时对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根本没有认识，甚至把错误还当成正确坚持。对群众中比较尖锐的批评，不仅听不进去，反而从资产阶级派性的观点看问题，认为这些同志是帮助地派说话。所以这次，只搞了两个星期，就草草收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现在读到这段语录，觉得非常亲切。回想在67年四月份整风期间，如果那时候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坚决改正错误，就不至于越陷越深，以至于68年再度酝酿反谢副总理。谢副总理姿态很高，再三说反他不算错误，甚至还说给他提意见是对的，谁再提这一件事，就是对毛主席不忠。但是我自己却不能原谅自己。（批语：后果应写出来。）因为我的错误是属于损害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性质是严重的。

由于两次整风走了过场，压制了群众的意见，零派开始出现了，要求校文革继续整风。我从派性出发，错误地认为O派的观点都是来自地派，对O派广大群众的合理意见不是虚心听取，而是组织支持我们的群众与之对抗，在辩论会上我也亲自登台公开辩论，企图以我们人多势众，把零派压下去。结果是压而不服，反对我们的群众越来越多。在一些机构里，也清洗了所谓零派观点的同志，这就使我们和群众越来越对立。

六七年六月五日，陈伯达严肃地批评了我们的错误。这时，我片面地强调敌人对伯达同志善意批评的恶意歪曲，挑动群众和我们对立，因此，对群众的一些激烈做法就十分抵触。脑子里只想到敌人对我们的陷害，而看不到大多数群众是对我们的错误不满。最典型的是在东操场的一次整风大会上，当有的群众冲会场时，我则挥舞大旗，表示自己绝不屈服，其实，这是向群众示威，这种对群众的恶劣态度，更增加了群众和自己的对立情绪。

六七年六月以后，校内分裂已成定局，终于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反对我们的五个组织，八月间成立了井冈山兵团。我对井冈山兵团的态度，一直是错误的，一直拒绝承认人家是革命群众组织。除了九月底在全市大联合的高潮中，

曾有过联合的愿望外，以后就在“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的口号下，一直顽固地坚持对井冈山兵团实行吃掉、摧垮的方针。当时我们有过明吃、硬吃或暗吃、软吃之争。我是主张明吃、硬吃的。对主张联合、承认人家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意见，我统统视为“不坚定”、“右倾”而加以排斥、拒绝。把自己的派性顽固性当成是什么原则的坚定性。表现出一副十足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架势，真是好像“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似的。当时我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如何搞垮对方，对革命大批判是兴趣不大的，有时也支持搞一些，但也是为了表示自己在抓大方向，作为攻击对方的资本之一。免得被对方抓辫子。

批语（第16页）：关于大方向的问题，应像你讲的那样讲出去，这样对揭发双方错误，对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都有好处。

中央文革揪出了王、关、戚之后，本来为我校的大联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时，本来应该遵照主席的教导，用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方法，首先是校文革向井冈山兵团的广大革命群众做认真的自我批评，然后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把矛头指向共同的敌人。现在想来，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革命大联合的实现是有可能的。可是这时，我自己的尾巴都翘的很高，以反王关戚“有功”自居，更加顽固地坚持吃掉、摧垮的错误方针。我把井冈山兵团受王、关、戚的某些影响，夸大为井冈山兵团受王、关、戚操纵，用以攻击对方。

今天看来，问题很清楚。井冈山兵团中和王、关、戚集团的人有过来往的，只是极少数人，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也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至于井冈山兵团的群众，如果有些同志一时看不清王、关、戚的面目，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阶级斗争十分复杂，王、关、戚他们那时还窃据着中央文革成员的要职，他们的罪恶活动，多半是背地里干的，为群众所不了解。群众出于对中央文革的热爱而说错了几句话，决没有理由抓住不放。对我校两派革命群众来说，对王、关、戚问题的认识只是个有早有晚的问题。以我自己为例，在六七年一月以前，对吴传启的面目就毫无认识，我那时还在群众中说他是左派，对他表示支持。我记得很清楚，直到在统战部夺权和洪涛他们发生冲突后，临走时我还宣布我们对学部是支持以吴传启为首的“革命派”的。如果别人因此而骂自己是保吴传启的，自己能心服吗？显然不能。同样道理，为什么对人家就不能谅解呢？事实证明，当王、关、戚被中央文革揪出来以后，井冈山兵团的广大革命群众，和新北大公社广大群众

一样，同样是坚决反对他们的。

为了压垮井冈山，六七年十月以后，除了在王、关、戚问题上大做文章以外，再就是抓住老保翻天问题攻击对方。

江青同志六七年九月中旬，尖锐地指出“北大老保翻天，起码是部分翻天”。今天看来，江青同志是批评我们不搞革命大联合，“打内战”，结果使陆平、彭佩云们安闲自在，有的甚至于暗自活动起来。至于“老保”是极少数，除了陆平、彭佩云外，就是那些犯了走资派错误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中还坚持错误的挑动分裂的少数人。而我们却不加分析地把站在井冈山兵团方面的干部，几乎都说成是老保翻天。大大扩大了打击面。应该说，站在井冈山兵团方面的干部，绝大多数也是革命或要革命的。他们对校文革在解放干部方面所存在的缺点错误的批评，有许多意见也是正确的。把正确的批评也说成是“老保翻天”是错误的。

为了压垮井冈山，我还利用67年12月9日井冈山六纵教工支队一张大字报的政治错误，曾想借机去抄原井冈山兵团负责人的办公室，经李清昆同志劝阻才放弃了这个错误主张。可是，那天不分青红皂白地开会斗争了仅仅参与写大字报、与那件政治错误无关的三个同志，在我和校文革其他负责同志在场的情况下，还使这三位同志遭到了一顿拳打脚踢。这个责任在我，我向这些同志承认错误。会后，又组织人到二十五楼前游行，还把兵团的两个负责人打了，这是很错误的，我向侯汉清同志公开表示道歉！67年12月9日的冲突，是我们挑起来的，主要责任在我。

和井冈山兵团的矛盾，本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唯一正确的公式是毛主席的“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毛主席教导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而我却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常常把对敌斗争的公式，用来作为处理和井冈山兵团的矛盾的指导思想，主张所谓“针锋相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对制止武斗有个非常错误的看法，把它和战争混为一谈。把战争必须用战争来消灭，错误地引申为“武斗只有用武斗才能制止”。我这种错误指导思想，在武斗期间，所造成的损失特别严重。

北大的武斗，是杨余傅倒台的前夕，通过傅崇碧煽动起来的。我们不是团结两派群众共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阶级敌人，而是站在一派一边，支持武斗，指挥武斗。三月廿八日，如果我们顾全大局不去攻占三十一楼，北大这场大规模武斗是不至于发生的。4.26武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也正是我这种错误指导思想所造成的恶果，我负有直接责任。是我从一派利益出发，图报复，不顾大局，决定去夺36楼的。结果使阶级弟兄互相残杀，许多同志无辜地流血受伤！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殷文杰同志的被刺死！4.27殷文杰同志的死和我的4.26的错误有密切关系。正因为我的错误决定，造成双方很多人受伤，当时，公社方面伤的较多，这就更使报复的情绪增加，导致了这样一起惨痛事件的发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直接犯下这一错误的同志，当然应牢记这一血的教训，不过，主要责任在我而不在他们。刘伟同志的被打死，我也是负有责任的。我请求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从这些血的教训中，本来应该使自己清醒起来，可是，资产阶级派性已使自己的头脑达到麻木不仁的地步。4.26以后，我们进而又把井冈山兵团围困起来，使许多在圈外的同志没有地方住，财产受到很大损失；被围在楼内的同志，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围在楼里见不了阳光，还给人家断粮断电，甚至企图断水，所受的摧残则更严重。而我当时，从资产阶级派性出发，还把这种局面看成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被围在楼里的是些什么人呢？今天就更清楚了，是我们的革命同志，绝大部分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是自己的阶级弟兄，我的所谓大好形势，恰恰是建立在阶级弟兄的痛苦的基础上，今天想起来，确实感到是莫大的耻辱！我对不起井冈山兵团的广大革命同志，对不起自己的阶级弟兄，请这些同志对我的错误进行严厉的批判！

在武斗期间，我们还搞了清理阶级队伍。事实上当时根本不具备清理阶级队伍的条件。可是，为了服务于摧垮井冈山兵团的错误方针，就藉口我们是有权力机构的单位，是具备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条件。清理的重点是参加了井冈山兵团的人。由于是从派性出发清理阶级队伍，因此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逼供信等严重违法乱纪的现象。

批语（第20页）：这里应讲明建立专案组的目的一一和李清坤讲的要相称。

批语（第21页）：抓人、逼供信、建专案要和李清坤同志讲的相一致才好。

而且要有感情，要有批判，（刘、陆、派性、私字）

对乱抓人、乱打人现象，新北大公社和支持校文革的广大群众也是十分不满的。群众强烈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可是，在一次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联席会议上，却错误地决定一般地严禁抓人，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可以经过批准再抓。我当时是分管清理阶级队伍的，就决定抓人要经我批准。我后来听到这一决定时，尽管对这一决定的提法有意见，因为校文革根本没有抓人的权利；但是，变换了一种说法我还是接受了这个决定，即不称为抓人，而称为批准隔离审查。其实，这也是自欺欺人。就是在这种名义下，校一级和有些系一级的专案对象，是经我同意之后，才抓的。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是违法乱纪的，且不说被抓的人，今天看来大部分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即使是真正的坏人，也不应该这么做。关于向坏人专政问题，毛主席在视察三大区后有明确的指示：“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

正是在我们的错误指导思想影响之下，才发生了一系列的极其严重的、令人不能容忍的逼、供、信的错误。过去，我们还藉口向专案组交待过，不能搞逼供信，因此，似乎这些现象的发生，与我们的指导思想无关。其实，这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如果不是为了服务于摧垮井冈山兵团的错误方针，有些专案就不会建立，而且抓人本身就是最大的逼供信。所以，逼供信错误的责任，不在于做具体工作的同志。而在于校文革，在于我。我向受害的所有同志赔礼道歉！并请求这些同志对校文革和我的错误进行严厉批判！

当对我们自己的错误有了一些认识之后，回过头来再来看看自己对井冈山兵团的看法，就更觉得是错误的。

直到刘信同志报告之前，在我思想上仍然不肯承认井冈山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刘信同志报告以后，我也只限于根据“九大”团结的精神，接受了这一个结论。但在思想上，对井冈山兵团的功，还是很抽象的。现在看来，不仅井冈山兵团的广大群众是革命的，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不少贡献，而且井冈山兵团的许多功绩，更值得新北大公社学习的。我想起在这三个问题上还是比较突出的：抵制了校文革的错误；维护谢副总理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等，同时井冈山兵团反对谭震林和二月逆流其他主要成员是坚定的。井冈山兵团和新北大公社一样，当然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各有自己的功和过。（批语：井冈山的功还可多

说几条)过去,我片面强调井冈山必须承认校文革,否则就是错误的。可是,别说武斗期间校文革站在一方,支持武斗、参加武斗、指挥武斗,即使以前也是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这又怎么能叫人家承认呢?过去我们片面强调校文革是中央和市革委会承认和支持的,因此,对方必须承认,可是,不论中央或市革委会,支持我们的只是叫我们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叫我们搞大联合,是我们违背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有什么理由去责怪人家不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应该受到批评的,首先是没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另一方面,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最高指示的错误,而上面提到的一些错误,也和这方面的错误密不可分,这是个根子。

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国唯一的领导中心。我们每一成就的取得,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英明领导的结果。我们有时做对一点事,也仅仅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话,听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我自己由于深受反动的“多中心或无中心论”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中后期之间,竟头脑膨胀,全身浮肿,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甚至连毛主席的话也听不进去。

我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往往是认为对自己有利的,就片面地大肆宣传,作为压制别人的资本。这种作法的恶果,今天想来是很严重的。这在客观上是起了离间一部分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司令部感情的作用,是损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种行为。为此而引起有的同志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想法,我们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批语:这一段认识深刻)

认为对我们不利的,就不愿传达,勉强传达,也加进派性的解释,寻找藉口,不坚决贯彻执行。很有典型的是对待去年五一节时伯达同志的批评。

聂元梓同志回校后,讲述了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首长接触的情况。而我们研究决定只传达见到毛主席的幸福情景,讲讲首长对我们的关心。至于伯达的严肃批评则先不传达。聂元梓同志在广播讲话中就是这样讲的,把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对聂元梓同志健康状况关心的话,也传达了。结果,造成公社中有的同志的误会,竟然刷出“热烈欢呼林副主席单独接见聂元梓同志”的大标语。为什么不传达伯达同志批评我们搞武斗,不搞革命大联合的重要指示呢?就是怕传达了影响“士气”使我们摧垮井冈山兵团的错误方针不能继续贯彻下去。后来,在公社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还是传达了,但传达以前,还在头头中先“统一”了

一番认识。经过这番“统一”，伯达同志的指示精神就走了样。传达后，也未认真贯彻。我在一次串连会上，怕群众把伯达同志的批评看得过重，还特地把北航的一份传达稿在会上念了一念。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看来，北航的传达稿比聂元梓同志的记忆，伯达同志对我们的批评要轻，对自己更有利。这是反动的“多中心论即无中心论”的一次典型的暴露。

从派性出发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更严重地是发展到对最高指示也是这样。例如曲解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实质的最高指示，为自己的派性服务，把与井冈山兵团的矛盾，说成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还有，正当我们在摧垮井冈山兵团的错误指导思想下，对井冈山兵团实行包围封锁，使自己的阶级弟兄受到严重摧残，我们在错误的泥坑中越陷越深时，1968年6月2日发表了我们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当时井冈山兵团的同志，用这一最高指示，对我们提出批评，今天来看，应该说，这一批评的基本精神是对的。可是当时从资产阶级派性出发，我拒不接受。总把“挖山”之类的举动，称作是保护群众，而打所谓的反动集团，也是对井冈山兵团群众政治上的保护，可以使井冈山兵团的群众认清他们面目，摆脱他们的影响。还说，镇压敌人和保护群众是相辅相成的，根据主席的最高指示，也可以说“对一小撮阶级敌人，是镇压还是保护，同样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由于这种说法在理论上似乎找不出什么毛病，因此在当时对煽动公社方面的派性，起了很恶劣的作用。问题不在理论本身，而在于用的具体对象。今天看来，我们当时如果根据主席的最高指示精神，接受井冈山同志的合理批评，立即改弦更张，那么我们的错误也可以早些得到纠正。事实上，不管承认起来有多么痛苦，武斗期间我自己确实是镇压了井冈山兵团的群众，是用国民党的态度对待了井冈山兵团的革命群众！

至于对待7.28指示的错误，更是不可原谅的。

68年的7.27，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正是从这一天起，伟大的工人阶级，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令下，开始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期被那些走资派统治的场所，开进了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成就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伟大事

件。可是消息从清华传来，已被资产阶级派性弄得头脑膨胀、全身浮肿的我们，轻信流言蜚语，认为可能中间有什么黑手。一方面连夜备战，一方面给中央和主席拍去明码加急电报。真好像大难临头一样。如果不是主席及时召见，亲自作了指示，二十八日果然是农代会组织的宣传队开进北大，让贫下中农流了血，那我们就将成为了不可饶恕的历史罪人！

28日凌晨，聂元梓同志被召见去了。下午，她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和他们谈了很长时间的话。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欣喜若狂。见到了毛主席，当然无限幸福。不过，既然主席亲自召见，肯定是收到我们的电报，对我们表示支持。于是就通知广播台，让他们鼓弄玄虚地连续广播：报告大家一个特大的好消息，然后不讲什么内容，就放“毛主席是我们社里人”的唱片。以此来鼓动公社的派性，来对井冈山兵团施加压力。过了一会儿，聂元梓同志就回来了。简单地和我们说了一下接见的情形以后，就被群众拥到大饭厅传达。当她念完谢副总理批准的传达稿以后，台下的群众，一方面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渴望知道毛主席更多指示，一方面也是由于被我鼓动起来的资产阶级派性，希望知道一些对本派有利的話，就要求聂元梓同志补充传达。聂元梓同志当时说不再讲了，我却错误地让她再讲一点，于是聂元梓同志就传达了一些不该传达的内容。聂元梓同志讲完后，我还讲了一点有关聂的家庭的一些事，目的是为了压井冈山兵团。这次传达造成的影响恶劣极了，不仅在校内，而且影响到了全市、全国。主席在召见中的指示精神，明明是严肃地批评了我们，并让我们坚决支持工人阶级开进学校。而这个传达，却变成了主席似乎是表扬了我们。把最高指示的精神，完全给弄颠倒了。不仅如此，对最高指示，本来应像林副主席所说的那样：“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而我们却不是这样。藉口安全还没有根本保证，就只拆除了外表的工事，而且，主席明明告诉我们要停止“内战”，搞大联合，我们却是宣传队进校之前，继续“内战”。

对待7·28最高指示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表明我们对最高指示也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表明我们对最高指示的执行不是坚定不移，而是动摇的，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在这一错误中，我也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之所以在文化

大革命中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关键问题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是像林副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对自己要一分为二，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而往往是对自己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对反对自己的人则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只想去革别人的命，而不革自己的命，正像林副主席所说的那样：“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思想呢？这与我在文化革命中背的两个包袱有关。一个是自己的出身历史比较简单；一个是过去和陆平做过一点斗争。因此就背上了“自来红”和“老造反”两个包袱。往往只能听赞扬，听不得批评。当听到别人说自己是什么“坚定的左派”时，不仅不感到惭愧，反而处之泰然；而对批评意见则往往听不进去，尤其是对比较尖锐一些的批评意见，更是一触即跳。这种状况，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群众，也是会严重妨害团结的，但一旦当了头头，就是个对群众的态度问题。

其实，自己所背的包袱，是毫无道理的。照理说，出身贫下中农家庭，就更应时刻保持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像我这样的人，既然是吃党的饭长大的，受党的培养教育这么多年，就更应想到自己目前的思想觉悟水平，和党的培养教育是多么不相称。过去世界观改造的就不好，到了大学以后，更是长期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工农兵，资产阶级思想又有新的滋长。尽管和陆平作过一点斗争，但是不表明自己就什么都好，恰恰相反——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在自己头脑里的流毒同样很深。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来红”的问题。实践证明，当背着这个包袱的时候，也正是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很严重的时候。

至于因所谓“老造反”而居功骄傲，更是荒唐可笑的。陆平王朝之所以被推翻，是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的结果，是广大革命群众共同斗争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自己至今也得在劳改。况且自己在过去的斗争中，和别的同志相比也差得多，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可是，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这一点却很不自觉，似乎所谓“老造反”就不会犯什么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事实表明，越是在这样想的时候，越是自己犯错误、犯严重错误而不自觉的时候。正像两报一刊在六月九日的社论所指出的那样：“那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的。”

从我自己所犯错误的亲身经验，证明这段话是千真万确的。

批语（第30页）：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世界观没改造好，表现在四个方面：
1. 自来红，这是唯心主义的。2. 老左派，“唯我独革，独左，正确”3. 思想方法上的偏激。4. 受刘少奇反动路线的影响。（对群众，对最高指示）（再批自来红时，是否可化家史？）

过去的错误是犯下了，它已成为历史事实，是无可挽回了。只有通过批判来肃清它的影响。

今后我一定要切实记取教训，虚心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劳动中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

我对自己的错误认识的还很不够，请同志们对我的错误继续开展深入的批判。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编读往来】

1. 蒋健纠错

137期 90页 吴越信的第一行的“17月”应该为“17日”

138期 84页 第一行的“我找”应该为“找”

85页 倒数第五行的“些了”应该为“写了”

87页 倒数第八行的“吕说”应该为“吕”

87页 倒数第六行的“公审入监”应该为“被捕入监”

2. 贡安南谈感受

我大致读了这137、138期《记忆》两期，觉得很好。内容真实，启人深思。对社会进步，思想启蒙大有裨益。

3. 张晓良、庄重远、杨光谈封面设计

137期刊头，保尔的头像被置换成斯大林，代表苏联的镰刀铁锤加上了代表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如此独特设计，配合余敏玲专稿，设计者似应在刊尾注明，也是尊重设计者的劳动成果。

张晓良 9-1

在我所见的民办刊物中，没有一个像你们这样注重版式设计和封面设计。尤其是教育、北大、江青等专辑的封面设计。设计和制作者是有追求的，而且不断进步。江青专辑的封面与137期的封面都是一个思路，但是这期的就比江青的好。前者有寓意，但让人看不明白（我是问了《记忆》的编辑，才知道江青的眼睛换了）。后者有寓意但不晦涩，一眼就能看出是斯大林和保尔的二合一。希望设计制作者朝这个方向努力。

任重远 9-2

我老爸喜欢看《记忆》，我以为它只是面对老年人的——只有他们才没完没了地唠叨文革。没想到，你们的杂志还很先锋。我指的是刊头设计。不知道这种风格属于什么主义什么流派，反正让我又惊诧又喜欢。

杨光 9-5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